

达尔文是对的

一个世界级打工仔的生存笔记

物质大排 强者生存



David
Liu
2003

修水库的中国农民工凭什么

挤进美国国防部？

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民工之间，美国国防部
正在悄悄地展开一场激烈的竞争。中国民工
正在为美国国防部提供军事服务。

美国国防部



目录

Content

- [\(1\) 心理障碍](#)
- [\(2\) 枷锁内的极限](#)
- [\(3\) 价值观](#)
- [\(4\) 平衡点](#)
- [\(5\) 好自为之](#)
- [\(6\) 在炽热的气温下](#)
- [\(7\) 中餐馆](#)
- [\(8\) 餐馆里的香港人](#)
- [\(9\) 高瞻远瞩地做人](#)
- [\(10\) 铤而走险](#)
- [\(11\) 有事没事都找警察](#)
- [\(12\) 沼泽边对话老布什](#)
- [\(13\) 各人有自己的追求](#)
- [\(14\) 寻找归属的感觉](#)
- [\(15\) 推销](#)
- [\(16\)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覆灭](#)
- [\(17\) 高级打杂](#)
- [\(18\) 保险公司之乱局](#)
- [\(19\) 中国留学生的圈子](#)
- [\(20\) 华人社区](#)
- [\(21\) 江湖码头](#)
- [\(22\) 政治生态环境](#)
- [\(23\) 美国公务员](#)
- [\(24\) 安良工商会](#)
- [\(25\) 上帝与我们同在](#)
- [\(27\) 飓风“安德鲁”](#)

(1) 心理障碍

一个个极具个性、出类拔萃却又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英雄形象在折磨着我。

有没有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充满生存竞争的世界，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都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是这样，具体到每一个人更是这样。

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反复教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又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在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在没有了工作，却有一大堆账单要付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到了我真的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了工作的时候，我想起了老师的教诲，老师在课堂上说的那几句循循教诲，真是太容易了、太温柔了、太无力了。然而，生活是残酷的。

中学毕业以后，有一年冬天，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到一个山沟里去修水库，住在树顶上搭的巢棚里。巢棚下山沟里的铁锈水潺潺流过。巢棚有用沥青纸做的顶，没有墙。风夹着雨雪，从棚子这边吹进来，又从棚子那边吹出去。晚上，我们几个民工挤在一块，天亮的时候，一根根的冰柱挂在沥青纸做的棚顶的棚沿上。最要命的是没有干净水喝，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有一天，我忍不住，喝了山沟里的铁锈水，晚上肚子和腿一直在抽筋，折腾得要死。那些水是喝也是死，不喝也是死啊！

可能是由于小时候过于残酷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心理障碍。

什么心理障碍呢？就是抱着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心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个你死我活的世界，积极参与生存竞争。竞争是死，不竞争也是死。“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极度扭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个个极具个性、出类拔萃却又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英雄形象在折磨着我。

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在二十来人的经济庭同事里面，有后来被双规的，有到澳门特别行政区去任职的。可能是心理的原因，觉得省法院经济庭的工作不大适合自己，便要求调动工作，然后就自费留学来了美国。

从此开始了为了工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生活。工作，炒更，跳槽；不是我炒了老板，就是老板炒了我。在这之间，就是养家糊口。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在省法院工作的时候，常常陪各级领导出差，大家都劝不要走了，“我们需要你”。但是我还是走了。十几年以后，再见到省法院的老领导，内心不无歉疚，辜负了他们的苦心栽培和期望。他们问我在什么地方工作？那时，我在美国国防部工作，做咨询合同工（consultant）。

(2) 枷锁内的极限

没有人会重用我们，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会重用自己的话。

工作，在省法院经济庭做过的工作大致分为法律法规制定咨询和参与审理案件。

其中以参与审理的案件最值得一说（案件当时未编纂成案例）：“中仪计算机案”——港商告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计算机购销合同纠纷；“马来西亚橡胶案”——新加坡一个保险公司对物诉讼，要求要回在广东汕头的一艘万吨货轮及其货物。

等等十几、二十个海商海事、税务、合同纠纷和劳务案件。

还参与接待欧洲共同体法院院长麦肯齐·斯图亚特等许许多多各国法律界、司法界人士，包括接待香港著名律师李柱铭、谭惠珠等。

为什么要离开省法院？

赴美留学路过香港时，见到了在香港的一些律师朋友。他们十分不理解我舍弃省法院的工作，自费出国留学的举动。多少人为了向国内跑，不惜一切代价。现在海归的就更多了。

很多人不在体制之内，感觉不到一个体制与个人的互动，以为海归回去了，就算是进入了体制之内，是自己人了。但结果往往是国外的人把你当成国内人，体制内的人把你看成是外国人。就像今天国内的某些非主流经济学家一样，无论他们如何受民众和媒体的吹捧，他们依然是局外人。

总想挂靠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但是心里头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挂靠也挂靠不住。我是从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上大学的。当时，外语热，就考上中山大学，学了英语本科。但是马上就觉得单学英语毕业出来以后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在学校期间，常常跑到法律系等别的系去旁听，被外语系老师批评为“搞副业”。

我们外语系德国籍老师玛丽亚和美国老师兰迪教的《欧洲文化》，历史系美国教授莫里森（由美国福布莱基金会派遣）教的《西

方政治思想史》，法律系中国教授陈致中教的《国际法》等课程，对我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

美国老师介绍的一本课外读物，对我的人生观很有启发。这本书叫做：《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作者：理查德·巴赫。我以为，这不是一本书，这就是我的生活道路。当时的思想可能有点幼稚，只是单向地想，更好地发挥个人的潜能，不断地突破个人心理上 and 体能上的极限：“你的整个身体，从这个翅膀的末梢到那个翅膀的末梢，只不过是你的思想的外壳而已，一个你能看到的外壳。冲破你思想的枷锁，你就能突破你身体的极限。”

一个人，怎么才算活得有价值？这是一个问题。一个人，能不能想做就去做，这个社会会不会让你想做就去做？这又是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想做就去做的话，就会与别人发生冲突，互相发生冲突，怎么办？自然法则认为一个人可以想做就去做。但是，用卢梭的话来说，叫“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具体的，每个人都有极限，都有上级领导；单位有单位里的领导，家庭有家庭里的领导。上级领导叫你去做，你就去做；没有叫的，你最好不要去做，这在美国的政府机关也一样。在中国，那时候有多少有个性的人被打成右派，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我也不是那么的天真，我也不认为，出国就有奔头了。出国了，由于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障碍，可能也没有出头之日；在工作上，也会受到排挤和打击。如果自己不善于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任何工作单位，都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就算在公司，在工作单位没有大的麻烦，在家庭里，也会麻烦不断。

有人把这些游离于各大体制怎么挂靠也挂靠不住的人，叫做“国际专业人士”。没有人会重用我们，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会重用自己的话。

(3) 价值观

只见他挥舞着手里的砍刀，护着那棵荔枝树，谁靠近，砍谁。生产队队长说话了：“这树是生产队的树，林牛，你想干什么？”林牛说：“解放前它是我家的树，你怎么知道以后它不会归还我家呢？反正我不让砍。”

在高级法院工作，不可能不考虑价值观的问题；在参与处理案件的时候，不可能不思考一些深层的哲学问题，不可能不思考一些根本的“法的精神”。如果都凭红头文件判案，还要法官干什么？如果不按红头文件判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准绳又是什么？

财产私有、公民意识、社会契约这些价值观能否为我们这个社会所接受？

在知道约翰·洛克的财产私有理论以前，有一件事使我大惑不解。那是“文革”末年，发生在我当民工的生产队里。生产队正在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连农副作物都不能种，只能种自己吃的菜。养一头猪要60%交给国家，自己只能留40%，政策上叫“调六留四”。连鸡都不能养，因为养猪、养鸡，种农副作物是搞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坚决消灭。搞的人是要坐牢的！就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有一天，我们出工去修整生产队的荔枝树。其中有一棵荔枝树的一根树杈，看上去已经枯死了。大伙一致认为要把那一根树杈砍掉。正要动手，有人大喊大叫地冲了出来，说“不能动我家的荔枝树”。这人名叫林牛。只见他挥舞着手里的砍刀，护着那棵荔枝树，谁靠近，砍谁。生产队队长说话了：“这树是生产队的树，林牛，你想干什么？”林牛说：“以前它是我家的树，你怎么知道以后它不会归还我家呢？反正我不让砍。”大家马上议论纷纷，有的说：“你家1958年入人民公社的时候，不是已经把树带入了生产队了吗？”也有人说：“搞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搞了二十多年了，树怎么还会作为私有财产还给你家呢？”无论怎么劝，他就是不让砍。念在他独

自一人养活着家里的老母亲的份上，大伙就让了他，没有跟他上纲上线，那棵树也没有整枝。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在旁看着，没搞懂，这都哪年哪月了，不是正在搞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吗？怎么还有人大喊大叫说生产队的树以前是他家的呢？

可是啊，你说他精神病也好，不开窍也好，到了20世纪80年代，那棵树真的又分还给他家了，生产队撤销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都私有了。

因此，人们对财产私有的自然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可剥夺的。约翰·洛克认为，财产、私有财产和个人劳动是分不开的。个人劳动创造了财富，个人劳动积累了财富。由个人劳动积累下来的财产，应该为个人所有，应该得到认可，应该得到法律保护。正是对私有财产的认可和保护，才激励了个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使人们的劳动有了价值。这也是今天保护知识产权立法的理论根源。如果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得不到认可和保护，没有价值，不能归其所有，你想还会有人搞发明创造吗？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没有价值，不能投放市场，换取生活资料，养家糊口，你想还会有人去工作吗？

作为向财产私有过渡，我国在1985年颁布了《民法通则》，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与世界接轨，2005年又颁布了《物权法》。

“文化大革命”最常用的词之一，叫一小撮“阶级敌人”。一旦把你说是—小撮“阶级敌人”，比如“地富反坏右”，你就成了专政对象，就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上大学的时候，历史系请来了美国教授，教《西方政治思想史》。他说到了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的公民制度，说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共和国公民理论之一，就是“少数人不能压迫大多数人，大多数人也不能压迫少数人”。由此知道，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的“群众专政”是与共和国公民意识相对立的。

在接待欧洲共同体法院院长麦肯齐·斯图亚特的时候，斯图亚特院长送给省法院一套有关欧洲共同体法律的书，其中包括一些案例。我把那套书看了一遍。令我感慨的是，整个欧洲共同体法律的中心思想

是保护共同体每个公民的权益，免受各成员国法律的侵害，从而保证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人员（主要是劳务人员）自由流动、商品自由流通（免关税）、资金自由流通、货币逐渐统一。其中一个案例使我至今难忘：有一个法国妇女在英国找到了一份工作，应聘到英国一个爱尔兰共和军的外围组织当秘书。那年月正是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大搞恐怖袭击，大开杀戒的时候。英国政府正全力封杀一切与爱尔兰共和军有联系的组织和个人。因此，英国拒绝给那位法国妇女发工作签证（1994年欧盟成立后，全部免签）。那位法国妇女到法国法院，要告英国政府。法国法院说这事不归它管，法国法院没有管辖权，不受理一个普通公民告外国政府的案件，大不了通过法国外交部写一个外交照会。那位法国妇女一气之下，直接告到了欧洲共同体法院。欧洲共同体法院立案审理，案例就叫做《某某法国公民告联合王国》。欧洲共同体法院判决英国败诉，说英国违反了欧洲共同体条约关于成员国之间的人员（主要是劳务人员）自由流动的条款。英国政府赔偿了那位法国妇女因拿不到签证而不能到英国上班的工资，同时英国也给她补发了工作签证。那套法律书里面还有许多类似的案例。

这个案例令我感慨的是：第一，作为欧洲共同体的一个普通公民那种至高无上、与生俱来的工作权利等基本权利，甚至是不可以被一个国家或政府剥夺的。第二，欧洲共同体法院要维护的不单单是一个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它维护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几百年来，甚至古希腊古罗马几千年以来，自然法和自然法则所倡导的公民意识的理念。

有一天，省法院领导让我去省党校听一个讲座。讲座由美国宝维斯律师事务所柯恩律师主讲“国际商法”。那是我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知道了“国际商法”的内容。上大学的时候和在高级法院工作的时候，我们讲国际法主要的是讲“国际公法”和“冲突法”。经济庭比较注重“商法”。讲座之后，柯恩律师派他们律师事务所的倪汝德（**Mr. Roderick MacNeil**）律师从香港到广州来带给我两本普通法系商法的教科书。那天晚上，晚饭后，我带倪律师从广州越秀公园小北门进，摸黑穿越越

秀公园的小路，边走边谈，走回他住的中国大酒店。倪律师现在在上海开律师事务所，不知道他对在广州走夜路是否还有记忆？

普通法系商法有二十多种，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破产法、票据法等；美国商法还包括了反垄断法和环境保护法；而英国商法还包括了工会组织法以规范工人罢工。商法的主要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契约”，就是“签合同”。一切商业行为，一切生意合同，都以“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愿意为准则”。而不是谁财大气粗，谁说了算；也不是上级领导说了算；或者谁官大，谁说了算。法官判案也是以“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愿意为准则”，而不是：我是法官，我说了算。

在商业契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就是由卢梭等人提出的“社会契约”的理论，和由横跨大西洋的“五月花”号帆船上，英国清教徒签署的“社会契约”的实践。

在我国，公有制一直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理想世界中占主导地位。近代的，有康有为、梁启超的“大同社会”，有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解放后，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有制，等等。由公有制所产生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穷过渡，大锅饭一直是人们的主流社会意识。人们已经习惯了“天下为公”的群众运动，而不是“财产私有”的独立思考；人们已经习惯了“天下为公”的社会抱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是“财产私有”的个人责任；人们已经习惯了“天下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不是“财产私有”的公民意识。

在人们的意识上，我们对财产私有的概念是脆弱的，这不是说人们不想拥有自己的财产，没有足够的私有财产，反对财产私有，而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在拥有私有财产的同时，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公民意识，应该负一种什么样的个人责任，应该怎样在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的同时又尊重别人的隐私和财产私有。

财产私有的观念与社会契约的观念是分不开的。财产私有确立了个人的定位以后，人们必然会以此为基础，追求结社，组成国家。以

个人意愿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提了出来。启蒙运动的时候，卢梭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

财产私有、公民意识、社会契约这些都是一些大道理。对这些大道理的进一步思考，就是法官的角色。我国法官的帽徽和肩章都有一架天平的图案。设计并批准这一图案的中国最高法院就是看中了那架“天平下面的支架”。最高法院的初衷是让法官成为司法审判的仲裁者，而不是领导者。但是最高法院的这一伟大理想能不能为她下面的各级法官所理解，去执行？我们都秉持公平办案、主持公道的原则。但是，我们却更加崇尚包公包青天式的县令，要做集行政、立法和司法于一身的“为民作主”的清官。我们长期受“要当好人民的父母官”等封建意识的影响，站在“人民的父母官”的角度去主持公道，而不是站在纠纷当事人双方聘请的仲裁者的地位上主持公道。“为民作主”毕竟是法官意志，不一定是诉讼双方当事人的意愿。你可以“为民作主”，也可以“不为民作主”；你可能是“清官”，但是诉讼当事人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并不一定要认为你就是“清官”。

这样的价值观，是不是很成问题？再思考下去，我问自己，是不是该出国了？

(4) 平衡点

如何去平衡个人的事业发展、进取心、金钱利益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如何判断哪些是眼前利益，应该舍弃，从而保证为自己事业前进的道路永远敞开；而不是发了一笔横财，就把自己前进的道路堵死了，甚至把命都丢了。

在省法院经济庭参与处理过的两个案件对我日后在美国生存、在美国工作有深远的影响。一个没有挂靠的“国际专业人士”如何去平衡个人的事业发展、进取心、金钱利益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如何判断哪些是眼前利益，应该舍弃，从而保证为自己事业前进的道路永远敞开；而不是发了一笔横财，就把自己前进的道路堵死了，甚至把命都丢了。

第一个案件是一个港商诉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的合同纠纷，我们叫做“中仪计算机案”。第二个案件是新加坡的一家保险公司对一条船的对物诉讼，我们叫做“马来西亚橡胶案”。

1982年，美国数码设备公司DEC总裁访问中国，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接见。方毅知道DEC公司的PDP和VAX大中型计算机独占世界计算机行业的鳌头。尤其是VAX系列计算机，采用32位数运算，兼容4GB储存系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批量生产的商用电子计算机。方毅副总理提出要买DEC公司的PDP-1128和VAX-780型号的计算机。美国数码设备公司DEC总裁一口答应，并跟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意向书。可回国以后，来信说，很对不起。说是：我们美国数码设备公司非常乐意赚中国的这个钱，非常想打进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可惜，美国政府不让我们公司出口给中国；因为这样尖端的计算机技术设备受到美国参与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1949年成立，并在朝鲜战争时期发挥作用的“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向共产主义国家出售尖端科技。中国是其中被禁的国家之一。

眼看着一个中美高科技产品购销意向书就这样黄了。

方毅接见DEC总裁时，在场的美国数码设备公司带来一位翻译人员，这里我们叫他小李，负责这个购销生意的口头和文字翻译。小李知道这笔生意不能继续进行，自己便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公司，去继续执行这笔生意。他带着这份购销意向书到美国找二手货。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知道小李这人，也因为要货要得挺急，就跟小李自己的公司签了一份合同，购买PDP-1128和VAX-780等计算机设备。

很快，小李便在美国购买了一批PDP-1128及其辅助设备。PDP-1128是VAX计算机的前身，在美国已经过时。小李并非计算机技术人员，他对所买的那一批计算机设备并不熟悉。货物进关后，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验货时发现，所有计算机设备和零部件不是过时了就是不匹配，基本上都不能用。

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已经付了定金，并根据信用证，在货物上船离开美国港口以后，付了第一期货款。当知道大部分货物不能用以后，中仪第一马上退货，第二责令小李按合同重新进货，要的关键是VAX-780。

小李拿了中仪的钱，当然也是国家的钱，买了一大堆不能用的货，退又退不了；再进好货，重新执行合同，又没有钱下定金买好的货。国内某某办公室和新华社又经常派人到香港催他，搞得他十分狼狈。情急之下，他找到了王老板（化名）。王老板一家在香港是殷实商人，主营大陆的山货药材的转口生意，兼营五金电器，对计算机也是外行。小李把他跟中国各位头面人物的合影照片给王老板一看，王老板认定小李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再一看小李跟中仪签的合同等文件，觉得这是一笔国家生意。国家需要，国家在召唤，匹夫有责。

王老板决定为了国家利益，挺身而出，为国家偷买偷运一回高科技产品。王老板的家人要王老板三思而后行。这计算机交货以后能拿到钱吗？这可是50万美金的买卖，一旦货物出手，收不回钱，王家的

全部积蓄就要泡汤了。为此，王家三代人开了一个家庭民主会议。通过辩论，会议决议：拿钱执行合同，到大陆一手交货一手收钱。

王老板和小李通力合作，使出了英国007特工的通天本领，瞒天过海，在爱尔兰买到了VAX-780。他们以转口为借口，报请不在香港出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计算机运回了香港，放在转口区。当时，连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想买却没有买成的VAX-780，就这样被运到了香港，放在启德机场的转口货物区的一个破仓库里。

一个晴空万里的星期天，他们买通仓库和机场保安，把计算机偷运出来，由沙头角进口运回了中国，一直运到杭州的一个单位。中仪和要货的单位马上验货，证明是好货，能用。

得了，货交了，收钱吧！王老板要中仪付钱。中仪说，这钱我不是付过了吗？是小李收的。当时，小李也在场，也承认已收了大部分的钱。中仪当场把尾数付给了小李。王老板傻眼了。这计算机是我出钱从爱尔兰买的，你们怎么把钱付给了小李呢？应该付给我才是呀？中仪说，我？不知道怎么冒出个您王老板来，合同是我们跟小李签的，他执行了合同，我们就付钱。王老板您如何跟小李在香港的公司签了什么样的合同，您应该找小李。小李拿钱以后，就偷偷溜了。王老板想把计算机要回来，再运回香港。可那是重要单位，有军队把守。王老板想一手收钱一手交货，连门都没有。中仪叫王老板回香港找小李。

王老板在香港找到了小李。小李这才把该笔买卖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并说，他拿到的钱大部分付给前一批的烂货了，他也是给人骗了，现在他也没钱；把他打死，钱也是要不回来了；与其把他打死，倒不如去广东省法院告中仪，中仪有的是钱，总会有个解决的办法。王老板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因此就告到我们法院了。因为是牵涉到了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省法院不知怎么就做了一审。

这个合同纠纷的案件，中仪、小李、王老板，三方各自都有过失。它告诉了我很多东西，一个人如何在如此复杂的、毫无依托的国

际环境下很好地把握自己？如果我是中仪，我会怎么做？如果我是小李，我会怎么做？如果我是王老板，我又会怎么做？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反反复复问自己这些问题。日后，我在美国遇到了一些类似的项目，爱国热情、革命英雄气概、拍胸口、打包票，都没用。第一，做项目，要能收到钱；第二，收钱要收踏实了，不要这头收了，那头又吐了出来，还留下一大堆后顾之忧；第三，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金钱利欲面前，我们要守住一条什么样的道德底线

(5) 好自为之

新加坡保险公司发现，他们公司承保的一艘万吨货轮在广东汕头附近的海滩冲滩了，船上的货物大部分不见了，船员也跑了。

另外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件就是新加坡保险公司对物诉讼，我们叫“马来西亚橡胶案”。

那天，领导叫我代表省法院去省政府开会。我不知深浅，骑自行车就去了。去了一看，到会的陆陆续续都开着小汽车来了，我是唯一一个既没有带司机也没有带秘书的与会者。会议由省政府秘书长主持，与会者有国务院的、外交部的，有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总经理，省公安厅厅长带着国际刑警组织广东站站长，总共十儿人。我一直在听，并在做记录。

省人保总经理把那家新加坡保险公司的一份报告向会议作了介绍。说是新加坡保险公司发现，他们公司承保的一艘万吨货轮在广东汕头附近的海滩冲滩了，船上的货物大部分不见了，船员也跑了。他们要求把船和货物要回。新加坡保险公司的报告附有一份英国劳埃德保险公司对该船在全世界全天候的监控的记录，哪一天、哪一刻在北纬多少多少度、东经多少多少度，以及该船的航海日志；还附有新加坡保险公司的侦探在广东汕头拍的该船的照片，有冲滩前在汕头港停泊时拍的，也有冲滩后在海滩上搁浅时拍的。显然，该船在进汕头港以前，已经重新刷了一遍漆，改了一个名字。但是，新漆并不能完全覆盖船原来的名字。船原来的名字在船首和船尾依稀可见。新加坡保险公司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有联保协议，因此，他们把这船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提出，看能不能把船和货要回来。这事该怎么办？怎么回复新加坡保险公司？省人保听从本次会议的决定。

省公安厅负责这个案件的国际刑警组织广东站站长向会议介绍了该船货物和人员在中国的流向。他说，有些货还在汕头，船长、船员们都从深圳出关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中国境内；省公安厅也没有扣

留任何人和任何货物。省公安厅是否要对该事件立案，也要听候本次会议的决定。

国务院和外交部的人回顾了以前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处理这一类事件的惯例，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所有的这一类民事财产纠纷都由外交部处理可能不妥，他们也处理不过来。中国不是也有法院吗？叫他们来法院告就是了。省法院不是也有人到会吗？

与会者大家一起把眼光投向了。我刚好坐在长条会议桌与主持人对面的另一端。我说，是啊，如果新加坡保险公司向省法院起诉的话，我们会受理这个案件的，很有可能我们作为一审。中美关系解冻以后，美国有人拿着清朝政府1910年发行的修建湖广铁路的债券向中国政府讨债，是为“湖广铁路债券案”，要当时的外交部部长黄华到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地方法院去应诉。那个地方法院还对中国政府作了缺席判决。后来，我国外交部向美国政府递交备忘录说，英、法、德、美等政府强迫没落的清朝政府向他们的银行借贷修建湖广铁路

（今天的京广铁路的一段）；根据清朝不平等条约衍生出来的债务，是为“恶债”，新中国政府对“恶债不予继承”。我说，这些美国人应该到我省法院起诉。告中国政府，或是告湖北、湖南、广东，被告人所在地的法院有优先管辖权，这也是国际冲突法普遍适用的原则。另外我国外交部还处理了一个案件：一个美国小孩放烟花，让烟花炸伤了眼睛，因为烟花是广东东莞一家工厂制造，结果他们告中国的烟花制造厂。后来是外交部在美国代为庭外和解，赔了钱。我说，他们美国人也应该到我们法院来告嘛！是赔钱还是不赔钱，谁赔谁的钱，得按咱们中国的游戏规则裁定。

会议最后决定，省人民保险公司应鼓励新加坡保险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因为诉讼标的在广东省境内，省法院有管辖权。所有有关该案的文件当场交给省法院。

我把文件带回了省法院，领导让我先把它搞出一个汇报提纲。我把它打开详细看了，竟然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伙台湾人，租了一艘日本制造的旧货船，雇了一个菲律宾的船长和一帮香港的船员，到印度去搞海上运输。接了一个印度货主的船运合同，是从马来西亚吉隆坡运输马来西亚橡胶和棕榈油。船和货物均由新加坡保险公司承保。船起航后，台湾人劫持了整条船和货物，令船长沿马来西亚西海岸各港口停泊，沿途兜售船上的橡胶和棕榈油等货物。后来，船穿过马六甲海峡到了马来西亚的东岸，船上的货物还剩了不少，台湾人决定把船开到香港，再继续找买家。离开了马来西亚东海岸以后，船就离开了它原来的航线，也不再向英国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全球船舶信息中心报告每天的航程。一艘万吨货轮就这样失踪了。

等到它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内的时候，船在香港已经改用了另外一个名字。台湾人向一家中国的公司——新力公司，出售橡胶和棕榈油。新力公司觉得货比较便宜，买了那船，然后就让他们到广东汕头卸货。台湾人凭空制造了一整套的产地证明书、提单、信用证等海运单据，开着劫持来的货物，就到汕头卸货了。

后来，省法院认定，中国新力公司买的是赃货；是赃货，就要退赃。那条冲滩的万吨货轮也判决归还给了新加坡保险公司。

本案对我的启示：第一，纠纷诉讼一上法院，无论输方、赢方，双方都肯定是亏了。新加坡保险公司拿回的万吨货轮只能作为烂铁拆了；橡胶能拿回一点，棕榈油都变质了。第二，本案最搞笑的是那位菲律宾的船长。老船长艰苦奋斗几十年，一直都是当大副，出不了头；临到要退休了，终于有人请他出山，当了一艘万吨货轮的船长。在菲律宾这样的岛国，能当上万吨货轮的船长，就等于我国今天能当上上市国营企业的老总，那可是人生一大业绩。老船长在他的故乡——一个港口城市大做宣传，大肆庆祝，父老乡亲们都来向他祝贺。结果，他灰溜溜地驾船冲滩，从深圳溜到香港，又溜回了菲律宾。当新加坡保险公司在菲律宾乡下一间茅屋找到他的时候，他连忙解释，劫持整条船和货物不是他干的。他正苦恼如何向父老乡亲们交代。第

三，一宗大生意后面，往往隐藏着方方面面非常复杂的关系；这些非常复杂的关系不是一个人可以想象，能够理解，能够妥善处理的，有时候，处理不好是会要命的。我们不是生活在小说里，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中。

处理这个案件正是我在办理出国留学的时候，在经济庭公布了我要出国留学后，同事们有勉励的，也有祝贺的，但我记住的只有一句话：“从今以后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6) 在炽热的气温下

迈阿密给了我一个终身难忘的印象：在炽热的气温下，满大街都是到处乱跑的热带蜥蜴。有些蜥蜴会随着周围的环境变颜色；在树上是绿色，在土里是灰黄色。有些蜥蜴是雄雌同体的，小时候是雄性，长大了是雌性；要雄性的时候是雄性，要雌性的时候是雌性。这算不算“适者生存”的最佳典范？

临出国的时候，在深圳，和省法院院长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食堂吃了晚饭后，去荔枝公园散步，他问我去美国什么地方，我说去佛罗里达迈阿密。他说他前不久去了一趟美国，也想去佛罗里达，想去看看那个发射航天飞机的肯尼迪航天中心。

就这样，我又一次把自己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下飞机，迈阿密给了我一个终身难忘的印象：在炽热的气温下，满大街都是到处乱跑的热带蜥蜴。有些蜥蜴会随着周围的环境变颜色；在树上是绿色，在土里是灰黄色。有些蜥蜴是雄雌同体的，小时候是雄性，长大了是雌性；要雄性的时候是雄性，要雌性的时候是雌性。这算不算“适者生存”的最佳典范？

来迈阿密上学是一个律师朋友拉里帮忙操办的，学校给我发了录取通知。来了以后，他马上介绍我认识了迈阿密其他的律师。其中一个是荷兰骑士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列昂·斯多克。二战时期，列昂曾是美国陆军情报部驻欧洲战区负责人，活跃于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战后回美国读法律博士以后，出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欧洲区总经理。跟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79岁，退休退过3次了。当务之急，他要带我到学校注册，因为那是开学的第一天，注册的最后一个星期。第二天，列昂和另外一个律师马克（现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带我到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找代理校长。代理校长有事曾经找过列昂。列昂简单地把介绍了一下，说：“我要帮这个中国年轻人，看你们学校能做些什么？”

代理校长二话没说，带着我们三人一起到了我申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商学院，找到帮学生选课的辅导老师，选了4门课；马上又带我们去了助学金办公室，免了我一年的外州学生学费。本州学费先挂着。另外的那个律师马克，把我入学的事宜做了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他的朋友，时任学校注册办公室主任，叫她把我学校的事情及时通知我本人或通知马克律师。后来，我在律师行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学校注册办公室主任还把我招收到她的部门做兼职。

按律师朋友拉里的安排，我应该是在律师事务所半天工作，半天上学。律师事务所坐落在人称“拉丁美洲的华尔街”的布里克尔大道。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是做律师专职助手，起草商业法律文件和负责由律师事务所组织的一个“中国贸易圆桌会议”做会务和咨询工作。参加中国贸易圆桌会议的包括物流与卡车租赁公司莱德系统（原来是美国第一租车运输公司，现在被优好公司抢了市场第一把交椅）等公司。

布里克尔大道北端跨越迈阿密河的桥上的雕塑

那是1987年。在中国贸易圆桌会议上，我主要是向那些要到中国做生意的公司，提供可行性意见以及有关中国商务和法律环境的咨询。但是由于刚从国内来，思想受约束得比较厉害，很多想法放不开，不敢想象。很多美国公司、美国客户提出的生意门路，我都觉得可行性不大。例如，与会者很多人都看到麦当劳将会在未来10年之内在中国遍地开店；我却认为，以中国人的消费水平，10年之内，不会有人肯花30元人民币去吃一顿美国快餐（当时，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是61元人民币）。时值，莱德系统正在与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洽谈用汽车把煤运到连云港，以纾解铁路运输力不足的困境。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是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与中国的合资项目，也是当时我们中国最大的合资项目。但我觉得中国公路发展，10年之内，也发展不到那个用公路代替铁路的地步。还有，有人想要到大连造游艇的事。项目很多，但是我一个都没抓住。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我确实想不到。在工作中，我浪费了不少机会，总之不是企业家类型的人，只好让发财的机会白白流失。

客观条件也有限制，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的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搞什么都是白搭。当时的想法就是：

首先要尽快熟悉美国的环境。连到银行存钱都不会，还谈什么做生意啊！

其次那些项目真要搞的话，没有美国绿卡，不能自由进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境，搞了，也是白搞。

工作有得做，关键是做了以后，如何才能拿到报酬、拿到钱。没有名正言顺的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认可的身份啊、学历啊等等，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太远；做了也就白做了，也不会拿到钱。

由于对美国商法不熟，律师事务所专职助手，帮忙起草商业法律文件的工作没有做好。在美国，干活就给钱，干多少给多少。不干，干不了，钱就没了。到了先欠着的本州学费到期要付的时候，我没有钱付那部分学费，学校注册办公室主任亲自到我宿舍（由于宿舍没有电话）告诉我，要我去找学校国际学生服务处。我把我的事、我的处境跟学校国际学生服务处说了。他们立马帮我办了一个能工作的社会安全号。学校注册办公室主任给了我一份在校兼职的工作。4.25美元一小时，一周工作10个小时。钱非常少。

这几份工作，死活养活不了自己，也交不起学费。情急之下，课余时间和周末再兼职打餐馆工。我是来迈阿密的第9天就开始打餐馆工了，当时只是周末做打杂。后来，做了企枱。那时候，一周除全职上课以外，还做五份工作。相信读者里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对吧？

但是也有理工科的学生，靠奖学金，或做助教TA、RA等，舒舒服服过日子的。

说有，马上就有。列昂律师到我妻子申请入学的那个学校，叫学校的校长为我妻子专门设立了一个校长奖学金，把我妻子给弄来上学了。现在是前妻了。前妻曾听过数学大师陈省身的课，搞拓扑。前妻一来，马上转学到了一个财大气粗的名校，名正言顺的奖学金就有了。

从此，我们家就靠妻子的奖学金生活了。

渐渐地，我辞了学校的工作，放更多的时间在餐馆打工。餐馆打工主要是时间比较有弹性，与上学不冲突，收入却可以足够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后来又慢慢辞去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工作，收入；收入，工作。哪些是实的，哪些是虚的，各人有各人的拿捏，各人有各人的期待。我知道，当时关键的是要有一个绿卡，最正常的手段，是必须先拿一个学位，然后找工作，搞工作签证，再搞绿卡。其他都是虚的。

当然，在纽约，我也有朋友用其他途径。或者，现在又有现在的途径。

写到这里，我和读者一样，看到了一个人，无论他是如何的三头六臂，他也需要别人帮忙、别人帮助、别人扶持、别人提携。有多少人无私地帮过我啊！可见，张口闭口“个人奋斗”，是多么的昧着良心。那些帮过我的人，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自己也破了产，有的因为工作原因不方便联系。大多数都失去了联系。我想，应该把他们找回来，好好地谢谢他们。

有人问，既然原来搞法律，为什么到美国以后，不学法律，而学了工商企业管理？

在国内办留学的时候，工商企业管理比较热，所以申请的是商学院。原来是想过学法律，但是在律师事务所兼职工作期间，发现拿了法律学位以后，很可能以后的客户会被限制在华人的圈子里，做做简单的移民案子等等。由于中国人消费观念与美国人不同，大家都不舍得花钱，所以，做中国人的生意，收费比较困难。而要是在美国大的

律师事务所工作，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大客户，很难升职做到合伙人；如果做不到合伙人，在律师事务所不可能长期做雇员待下去。在加州、纽约的律师事务所，还有中国人律师的发展空间；而在佛罗里达、迈阿密，比较难。另外一个，没有看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世界接轨的规模，很多人不是做了各大律师事务所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了吗？

当时觉得，工商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出来以后，可以到一个美国大公司工作，选择的范围会大一点，收入会稳定一点。

(7) 中餐馆

由于没有车，上班是走1公里，坐公共汽车5公里，然后再走2公里。打伴回来的时候，餐馆的人会送我回来。星期五，上午在律师事务所上班，下午跑到餐馆当打杂。工资是餐馆老板给2美元一个小时，其余的由企枱分给我小费的10%。那个餐馆周末是打“共产”的，也就是把所有小费放到一块，最后才按比例分的。

如果有人问，哪一份算是你来美国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我肯定会说是餐馆的那一份。因为，中国餐馆的工作，是真真正正能让我自己养活自己，加上能赚钱交学费的工作。中国餐馆真正让我感到，在迈阿密这个外国的外国、这个西班牙语的环境里，有我的一个栖身之地。就如同当民工修水库那年的那一个树顶上的巢棚，那个巢棚虽然四面透风，它还有一个用沥青纸做的顶，能管点用，还能栖身。

来迈阿密的第二天，一个中国留学生把我带去了一家中国餐馆找工作。餐馆是台湾来的于老板开的。于老板是山东人，国民党老兵，1949年跟部队去了台湾。38岁的时候移民来了美国。在迈阿密开了一个中国餐馆。他对我说他们餐馆周末三天比较忙，需要一个打杂的，工作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我什么时候安顿好了，周末就来上班。

到学校注册完了，住进学生宿舍以后，周末我就去上班了。由于没有车，上班是走1公里，坐公共汽车5公里，然后再走2公里。打伴回来的时候，餐馆的人会送我回来。星期五，上午在律师事务所上班，下午跑到餐馆当打杂。工资是餐馆老板给2美元一个小时，其余的由企枱分给我小费的10%。那个餐馆周末是打“共产”的，也就是把所有小费放到一块，最后才按比例分的。

虽然工作是洗厕所，递茶送水，收拾桌子，周末有个地方去，与周日的上课调节一下，工作生活都还凑合。

于老板常常教导我们，要努力工作，总能在美国安身。他说美国是一个好国家，兼容性大，基本上只要来美国了，就总能搞到美国合法身份。他说他是过河的卒子，有来无回，断了后路。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夫妻俩一块在一个餐馆干打杂和洗碗。熬过来了，挣了钱才开了餐馆。餐馆原来是在购物中心的一个角落，后来扩大了，又搞了敞开式厨房。餐馆非常干净高雅，成了当地最好的中餐馆。

我的几份工作的反差有点大。学校注册办公室的工作是公务员，平铺直叙。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出的场面比较多，接待客户、代表团。上班的时候，西装革履，穿戴整齐。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什么人都有，有一天，来了一伙人，说自己是深海探险家。他们在加勒比海某处海底发现了18世纪的一艘满载黄金的沉船。他们要请律师代表他们处理打捞上来的黄金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脱了律师事务所的西装，穿上餐馆的工作服，洗厕所，收拾桌子。我从来没有告诉于老板或其他人我的心理反差。但是老板还是看出来了。有一天，律师事务所下班以后，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把我送到了餐馆，接着打餐馆工。进门以后，于老板说，“小邓，你的朋友开这么好的车呀？”

过了一个星期，老板让一个同事企枱阿洲来我宿舍告诉我，我不需要上班了。说是老板台湾来亲戚了，把我的工作给顶了。这是我第一次给“炒鱿鱼”了。

过了几年，再见到了于老板，是在台湾驻迈阿密的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宴会上。他问我：“小邓，你怎么也来了？”他看到我也拿着请帖。

出外靠朋友。有些人的朋友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使我一辈子都感到汗颜。餐馆企枱阿洲受老板之托来告诉我不需要再去餐馆上班了。他为我平白无故被“炒鱿鱼”而忿忿不平。当即，把他那天的全部小费掏出来给了我。我说我还有其他工作，还有其他收入，钱我不能要。他马上说，第二天带我去考驾照。因为没有车，我不能去远一点的餐馆打工。有车就好办了。他带着我连续折腾了3天，终于把驾

照考了下来。这样来迈阿密3个月以后，我用8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车，是一辆“道奇”，然后就上路了。

有了车，到第二个餐馆找工作，工作是backup busboy，是打杂的后备。打杂都不是。

义气世仔阿洲见我如此落魄，介绍我去了第三个餐馆当企枱。

在餐馆当企枱的工作，与老板们的关系体现在：第一，老板安排企枱的工作时间表；第二，老板带客人位置，把好的客人带给哪个企枱等事情上。由于要上学等原因，一周我只能工作8个单位时间，也就是4个整天。餐馆一直都对我比较迁就。迁就不过来的，我也会知趣地到别的餐馆兼职。带位的事情上也比较公平，在两年内，没有争吵过，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在餐馆当企枱的工作，与工友们的关系体现在开店前的准备工作和收工后关门前的收尾工作上。两年下来，跟工友同事没有发生过争执。餐馆的那拨工友同事，真的可以称得上朋友。为了这拨朋友，我觉得一直在餐馆里面干也行。后来他们都出来做了自己的生意，开餐馆，开杂货铺，开花店啦，等等。

在餐馆工作的最大收获是学到了在美国生存的基本知识，如维修汽车、进入华人社区、华人团体、保险、医疗、人身安全等等。

(8) 餐馆里的香港人

一年赚十万，你是餐馆老板，赚一百万，也是餐馆老板；开一家餐馆，是餐馆老板，开一百家餐馆，也是餐馆老板；总之，一辈子就是一个餐馆老板。后来想了一想，算了。人各有志，对此，我不好多说。

我工作过的第三家餐馆的老板一家人从香港来，也姓邓，祖籍还是同乡。同乡的概念，我比较薄弱。广东人，讲广东话的都是同乡，至于是南、番、顺，还是四邑，在国外倒没有什么界限。只是在美国大多数广东人都是我们四邑人，祖先从台山、开平、恩平和新会来的。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到了美国的中国餐馆工作，现在才知道，早期来美国谋生人，那些第一代移民很多人都在中国餐馆工作过。

老板中最小的弟弟大只强，从当地有名的大学毕业，Double“E”，电气工程师，到了电力公司工作。未几，辞职回来参与经营餐馆。理由是他的上司退休了，上司退休的时候，工资才5万多美元，还不到他开餐馆的哥哥赚的一半那么多。我想对他说：你一年赚十万，你是餐馆老板，赚一百万，也是餐馆老板；开一家餐馆，是餐馆老板，开一百家餐馆，也是餐馆老板；总之，一辈子就是一个餐馆老板。后来想了一想，算了。人各有志，对此，我不好多说。不过有不少的香港人胸怀和眼光确实受到某种限制。什么限制，一下子又说不上来。我问义气世仔阿洲，如果他发达了，回香港给他一官半职，他最想当什么？他说要当香港娱乐事业总董事长。

有些方面，香港人却是当仁不让。大只强原来的女朋友叫细纹，也从香港来。细纹把香港人那一套人情世故，职场是非搬到了美国来，天才地、创造性地发挥了《红楼梦》里王熙凤搞是搞非、搞风搞雨的手段，无论在公司里，还是在亲戚里，把她周围的人搞到了云里

雾里。他们俩在最后决定婚姻关系的时刻，让老板一家人否决了。细纹自杀，未遂。

这些破事，跟找工作有什么关系呢？有。细纹在一个上市的美国公司工作，立马把她的精力转到公司里来，使出浑身解数，傍上了公司一个大股东，也是公司的副总裁。作为第三者，竟然让那个美国人与结发之妻离了婚，并娶了她；转身就做到了这个上市公司的上层，并对公司的决策有枕边风的作用。不过，美国有美国的公司文化。美国公司里的人与人的关系比较松散，权力斗争、路线斗争没有长期化、复杂化。美国的公司Corporation与香港和内地说的Company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在美国学《公司法》的会明了和分清这两者的区别。美国上市公司，以股份说话，跟香港的家族式管理不同，大多数决策都是公开的、透明的；还有家眷回避制度。跟副总裁结婚，自然就要离开公司。细纹只好离开了公司，另谋高就。

后来公司卖了，她丈夫的副总裁的头衔和收入就没了。可能觉得她的丈夫一个糟老头子闲着没事一天到晚待在家，了无生趣，细纹故伎重演，傍上了一个美国医生。这回可没有那么幸运，那个美国医生把她这个第三者给甩了，回到了自己老婆身边。因为婚外恋这事，细纹丈夫又跟她离了婚，把女儿也带走了。细纹从此过起了单身生活，逢人便说那个医生欺骗玩弄了她。怎么会这样？女人，你们究竟有没有一条做女人的底线？

(9) 高瞻远瞩地做人

香港电视剧常常会有那么一句父亲训斥不孝儿子的台词，“你再不听话，我送你到南美砍叉烧！”可见到拉丁美洲开餐馆砍叉烧在香港人的眼里与清朝时期充军新疆伊犁无异，与右派被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无异。

迈阿密，人称“拉丁美洲首都”，66%的人讲西班牙语。有些社区讲西班牙语的人的比例高达95%。不会西班牙语，连上超市买菜都有困难。到迈阿密上学不是我的初衷，虽然上初中时就知道了佛罗里达，有书介绍说，作为人类进化的证据大沼泽国家公园边上的人还长着一条尾巴；上大学时又知道了风流浪漫的迈阿密海滩。是前妻先申请出国留学，选了迈阿密的大学。我算是来帮她打前站的。

香港电视剧常常会有那么一句父亲训斥不孝儿子的台词，“你再不听话，我送你到南美砍叉烧！”可见到拉丁美洲开餐馆砍叉烧在香港人的眼里与清朝时期充军新疆伊犁无异，与右派被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无异。在迈阿密的中国人，许多都是从南美移民过来的。去南美的很多人原籍是广东恩平。

餐馆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企枱“咸蛋黄”，斯斯文文像一个学生，原来却是水手，跳船，滞留在美国。企枱“瘦马”，志大才疏，从广州几经周折跑到了墨西哥，又从墨西哥边境偷渡来了美国。人家问他为什么那么瘦，他说瘦点正好在香港跑马地当驯马师和骑士。企枱阿乐，单身大帅哥，原来却在洪都拉斯印第安人部落和一个部落女人生了三个孩子。他告诉我，三个孩子都是他亲手接生的，绘声绘色。我仿佛看到，在那个印第安茅棚里，鲜血淋漓；听到传出的婴儿的啼哭。

企枱郑生是从尼加拉瓜移民过来的。原来正人君子到处都有，中国有，美国有，南美的中国人也有。郑生就是正人君子的代表。他当企枱从不迟到早退，从不偷工减料，从不欺骗老板或欺骗顾客。中国

乒乓球队访问迈阿密，他还请江嘉良吃了顿饭。老华侨十分热爱伟大祖国，曾和他哥哥一起应邀回国参加国庆观礼，说是临别时，送给了接待他们的中国官员每人一块纪念金币。

郑生原来也是一方豪绅，在尼加拉瓜首都附近的一个小镇，拥有一条商业街。不是一两个店铺，而是整条商业街都是他们家的，包括一个电影院。1978年，武装起来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推翻索摩查亲美家族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郑生害怕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作为土豪劣绅清算，慌慌忙忙把家业变卖，把钱埋到地下，然后跑到了美国。1979年，尼加拉瓜共产政权建立。情况稳定了，郑生跑了回去，把钱挖出来。可惜啊！索摩查统治垮台以后，自然，他们的货币就不用了，所有的钱变成了一堆废纸。郑生一辈子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家业，基本都泡了汤；只好携家带口，跑到美国打餐馆工，从头来过。

郑先生的遭遇，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做人要高瞻远瞩地看到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怎么可以被人家杀到了家门口，才慌慌忙忙地把一辈子的积蓄埋在地下，然后逃跑呢？怎么说，都要预先把钱换成美元，然后带着美元跑呀！

谁知道呢？也许，换了美元带着跑，刚好美元也不再值钱了。

(10) 铤而走险

有一阵子，我有点飘飘然，觉得，这么多人冒死，铤而走险去抢银行。为了什么？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就为了抢到钱以后，能跑到迈阿密买个房子，享乐人生。好了，现在，我不用铤而走险去抢银行了，生活在了迈阿密，车有了，房子有了，家有了，孩子有了，可以享乐了。何乐而不享呢？

美国对迈阿密的宣传有点邪乎。系列电视剧《迈阿密风云》、《犯罪现场调查CSI》、巩俐参加拍摄的电影《迈阿密风云》等，全都是一个主题：迈阿密是万恶之源。美国的什么闻所未闻的破事全发生在迈阿密：贩毒、贩卖人口啦，巴拿马总统被抓到迈阿密坐牢啦，古巴有一个小孩让联邦调查局武装特工三更半夜抢回来送回古巴给他爸啦，美国总统候选人戈尔和布什选举记票有误相持不下得用手重新点票啦，等等；要多不可思议，就有多不可思议。在迈阿密买辆车，有人会拎一袋现金往车行一放，拿车钥匙就把车开走了。有人可能说我在编故事，这么多现钱，车行怎么往银行存呢？联邦调查局不会告车行洗钱吗？这就不是你我的事了，车行经理自然会搞定。这都搞不定，在迈阿密还做什么生意啊？

有一阵子，我有点飘飘然；觉得，这么多人冒死，铤而走险去抢银行，为了什么？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就为了抢到钱以后，能跑到迈阿密买个房子，享乐人生。好了，现在，我不用铤而走险去抢银行了，生活在了迈阿密，车有了，房子有了，家有了，孩子有了，可以享乐了。何乐而不享呢？

有一天，餐馆刚做完午餐，楼面经理阿伟拿来了一份当地的报纸，说是绑架香港首富之一王德辉、勒索赎金的主犯在迈阿密落网。主犯化名“杨太”，在我们家住的叫肯戴尔的居民区被捕。“杨太”曾借打麻将的机会接近王德辉太太龚如心，摸熟了王家的门路和作息时

间，并决定绑架后赎金在台湾和日本交割。绑架得手后，“杨太”经台

湾，到日本，到加拿大，再到大开曼群岛，几经化妆整容换护照；然后，从大开曼群岛移居迈阿密。她买了一幢房子，开一辆保时捷，为人十分低调。香港国际刑警，也在我们居民区附近买了一处房子，花了两年时间从她的垃圾中收集她的犯罪证据。最后把她收捕归案。

大厨谭生也少有地出来听我们议论这个事，说是国际刑警好生了得，花两年这么长的时间，耐心地收集罪犯家倒出来的垃圾，筛选收集证据。议论完了，他和阿伟跑到了一边嘀嘀咕咕不知继续说些什么。

谭生是老板娘文姐的堂哥，炒得一手好菜。我最喜欢吃他做的“串烧带子”，那是下了牙买加Rum酒的（一种甘蔗酿的酒）。谭生长得像李小龙，只是多留了两撇八字胡。他说话办事，给人一种气势，让人觉得他是个有担待的人。不知道是拿炒菜的勺拿多了，还是拿枪拿多了，手腕动作特别利索。阿伟祖籍是上海，香港出生和长大的香港人，知识丰富，思路敏捷，语言动听，可以与任何食客用任何语言（英语、西班牙语、国语、上海话、广东话）谈论任何话题。跟他聊过的食客，有很高的回访率。阿伟让人一看就知道是电影小说里面当军师参谋之类的人物。

他们平时很少参与我们企枱的闲聊话题。我只知道，他们有嫖妓，染病了的话，会让文姐介绍医生给他们。他们要打青霉素。

他们赌博比较凶，有时与厨房的其他人在没有赌具的情况下，拿几根火柴也能赌上一阵，用手拿着火柴，猜哪根火柴有火柴头，哪根没有。大老板阿伯也在厨房工作，不过是给他们当下手，炒炒饭。他们赌博赌到忘乎所以的时候，会透露一下他们曾经在纽约开有几家按摩院和地下赌场。经常跟他们一块开赌的主要是厨房的一拨人，一个越南华侨阿安，另一个南美人“瘦鸡”。阿安头大眼大，人称“神童”，工作勤勤恳恳，凡事听大老板阿伯的话，属于“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的那一类。“瘦鸡”大名叫Jose。西班牙语发音“hou-sei”。“瘦鸡”的一生不知道有没有做过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一年365

天，起码有300天，他是无照驾驶的。大只强的哥哥常常要到警察局把他领出来。他无亲无戚，孤独一人，得过且过。他天天收工前都反反复复说一句话：“Another day, another dollar”。迈阿密的人有一句口头禅：“No way, Jose”，用来说他也挺合适的。他们俩都十分的单纯，心地都特好。这么说吧，如果他们要骗我的话，我是心甘情愿地让他们骗的。

终于有一天，联邦调查局把阿伟找去了。谈判结果，阿伟愿意出庭作证，协助警方起诉谭生。原来谭生是纽约和胜堂堂主，有案在身，被联邦调查局追诉，跑到迈阿密躲了起来。阿伟是他的军师。

我没有看到起诉他们的罪状，不好在这里乱说。只是知道，阿伟被无罪释放，现在迈阿密成家立业，平安地生活着。谭生被判无期徒刑，不堪忍受无聊人生，前几年（2006年）狱中自杀。

这是餐馆老板大只强告诉我的。

(11) 有事没事都找警察

从一个环境换到另一个环境，有一个适应过程。我来迈阿密的时候连沃尔玛、道奇是什么都不知道，其他很多东西自然就没有办法明白了。有时候，一个问题要问别人很多遍，别人回答很多遍，才能够弄明白。当然还要对比一下，在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的东西。如果找不到一个跟中国的东西相对应的，就只好干着急，或等以后慢慢再去理解。我知道，遇到的有些东西，一辈子都是理解不了的；也就只好抱憾终身，死不瞑目。

工作上，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一样，有一个适应过程。例如，在国内的时候，那时还没有手机，在街上办事打电话，我们公检法单位的要不就是到民警的交通岗（现在连交通岗都没有了），要不就是到派出所。反正是有事就找警察。

刚到迈阿密的那天，律师朋友拉里刚好有事到加州去了。他给我留了一个条子，说要过几天才回来。这几天如何安顿？那时候出国不像现在，现在出国的都腰缠万贯，那时候总共带的就那么几百块钱。要不先找警察问一问，看他们有些什么好的建议？下飞机的时候，我已经把行李寄存在机场的行李寄存处了。现在是轻装，习惯性地，我截了一辆警车，是一个女警察。我把我的情况跟她说了一遍，我说我是中国人，主要是带的钱不多，不想住太好的旅馆，看有什么别的地方好去住几天？首先，她建议我去难民营，说这里有一个难民营，正住着一拨从泰国来的难民。我问她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更好一点的选择？她想了一想，说：要不去中国餐馆？我说：行！她用警车里的电话跟警察局汇报了一下，便让我坐上警车，带我去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中国餐馆的经理对警察说：“就把他交给我们吧！”警察走后，中国餐馆的经理就把我带到迈阿密大学的中国学生宿舍。

当然，在美国，警察不是随便能找的。大多数情况是警察来找你。要是警察真来找你了，多半不是什么好事。

妻子来了以后，我们住进了迈阿密大学的宿舍。晚上从餐馆打工回来，学校停车场都泊满了，总找不到泊车的位置。我总是泊在停车场的边上，车子有一大半在停车场，却有两个轮子压到了停车场边的草地。我总觉得这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是买了准许泊车的许可证的。你学校收了钱，总得让我有个泊车的地方吧？

有一阵，警察每天来给我一张罚单，说我压草地了。那天星期天，我正要上班去餐馆打工，看到车前玻璃的雨拨上，警察又罚了我一张新的罚单。一想到一天打工的工钱就让警察罚没有了，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开着车就去追那辆警车，要找警察评一评理。警察没注意我来找她，在另外一个停车场停下来，女警察下了车，一扭头，看到我怒气冲冲地开着车向她冲来，马上就呼叫了增援。很快很多警车就围了过来，我还手里拿着罚单，要跟他们评理。他们要抓我。几个警察商量了老半天，然后一个警察走过来说要逮捕我，罪名是袭警，刑事重罪Felony。

我还要争辩：“这是在校园停车场呀！”他们帮我带上手铐。

“你现在有权不说话，但是你说的所有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警察对我说。

在把我带到警察局的路上，警察问我是什么签证？是不是E签证，有没有外交豁免？那天是星期天，警察局拘留所没人上班。警察对我说，对不起，今天你运气不好，认栽吧！今天这里没人，我们要把你关到迈阿密县的监狱去。警察还对我说：“这不是我要这么做，是上头的意思。”警察还说，“我会叫县监狱的人对你好一点的。”

迈阿密县监狱是大监狱。还关过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国内的监狱，我去过几次，是带外国司法代表团去参观我们的模范监狱。没想到，我也有机会蹲一蹲监狱。还是蹲美国的大狱。

监狱的门卫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森严壁垒。跟着警察进了里门，一条走廊，边上长条的木凳上放着包装好的三明治，进来的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拿来吃。进到里面，办入狱手续，把身上所有的东西交给监狱

保管处，然后要被关到一个临时大间。我跟带我来的警察说，我是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能不能让我给我的律师朋友打个电话。警察跟监狱里的看守说了一下，便把我带去打电话；然后，警察就走了。我的律师朋友拉里在电话上一听我蹲了大狱，他笑了，说他以前看球赛后跟球迷闹事，也蹲过大狱。先蹲着，他会把我弄出来的。

我又给很多地方打电话，给妻子啦，给餐馆啦，给学生会啦。一转眼，晚饭时间到了。看守端来了一个很大的黄色的塑料盒子，打开里面有四格，一格放的是牛肉饼，一格是奶酪通心粉，一格是玉米粒红萝卜，还有一格是水果。量大，起码够两个人的份。难怪街上这么多的人想进监狱。吃完饭，看守要我进里面的临时大间。

里面都是今天刚抓进来的人。除了衣衫不整的黑人、南美人以外，有一位老人是跟他的老太太一块被抓进来的，进临时大间以前，把他们俩分开了。女的另有一区。他们俩是在高级商场偷东西给抓的。里面还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白人青年。他在大喊大叫，要放他出去。不知他犯了什么事。天黑以后，看守把我们带出临时大间，去换囚衣，洗澡，然后是分牢房。这时，保我出去的人来了。他把我领出监狱，送回了家。

我的律师朋友拉里没有直接来保我，而是花钱请专门做这一行的人来保我出狱。原来美国专门有人吃这一行饭，专门保人出去的。他们的收费是法定担保费里面的一个百分比。那天他收了律师行10%或150美元。我的保释金是1500美元。中文叫“取保候审”。也就是说，在法庭传唤的时候，我要按时出庭。不出庭应诉，1500美元就没有了。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的警署取回被扣下的车，那个送我去监狱的警察一脸歉意。你们一脸歉意，我以后麻烦事就多了。

律师行先派人帮我出庭。带我上庭应诉的那位律师与审案的法官过去是同事，法庭上互相问好，聊了几句以前的事，控方警察也没来人，法官便把“袭警重罪”打成“交通纠纷”，发配到交通庭。过了两个

月，又去交通庭打成“无罪”。从此以后，什么搞绿卡，入籍，申请政府工作“安全清查”都要把这个“无罪”的法庭记录附上。

(12) 沼泽边对话老布什

老布什停顿了一下，不知是否感慨“大沼泽边上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跑来了一个中国人呀？”然后问我从国内哪里来？我说从广州来。他说：“广州，我去过呀！去过两次，是为筹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去的。好地方。”

从监狱出来后不久的一天，去学校上课。阶梯课室周围站了不少人，进课室要检查驾照和学生证，看是否注册了这一节课的学生。进了课室，里面也站了不少人。一会儿，校长到讲台来介绍，副总统老布什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到我们课室来发表竞选演说。

老布什登上讲台，滔滔不绝，老生常谈地演说了十几分钟，有人递给他一张条子。原来是我们的州长鲍勃·马克廷尼兹溜进了课室，偷偷地坐到课室的最后一排。州长估计是来向老布什的新政府班子找工作的。老布什点名叫州长坐到前面来。州长死活不肯。老布什又继续演讲。

演讲以后，是提问题时间。很多人举手，我也举了手。第一个被点到提问的是一个古巴籍学生，问及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和对古巴新移民的态度。1981年，卡特总统鼓吹向古巴输出人权，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响应号召，开放古巴监狱，让古巴大批刑事罪犯涌到美国来。从那时候起，迈阿密的社会治安急剧恶化。街头犯罪、示威游行、监狱暴动时有发生。阿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疤面煞星》反映了当时迈阿密混乱的社会现实。随后，美国关闭了海岸线，不让古巴人偷渡美国投奔自由。这就是古巴学生提问的背景。老布什回答谈及向古巴输出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性，却回避了是否继续接纳古巴偷渡的非法移民的问题。

我被点到，作为第二个提问者。我的问题是关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当时，学校在联合国国旗日挂的还是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旗；校方也搞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区别；中文也不

能作为外交外贸专业选修的“外语”，虽然中文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校方死活不认。老布什停顿了一下，不知是否感慨“大沼泽边上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跑来了一个中国人呀？”然后问我从国内哪里来？我说从广州来。他说：“广州，我去过呀！去过两次，是为筹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去的。好地方。”那时他是美国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然后，他重点说了，台湾过去是美国的盟友，对老朋友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就算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地位早就有了公论，美国对台湾这个老朋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我相信老布什不是敷衍我才说的，作为老一辈的共和党人，对于那些曾经支持过美国海外政策但现在落难的前盟友以及前盟友的遗老遗少，老布什有着一种深厚而朴素的阶级感情。

演说完了以后，老布什带着他的一行人马，到了一家尼加拉瓜餐馆牛肉城**Los Ranchos**吃饭。前文所述，197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亲美家族独裁统治。索摩查家族逃到了迈阿密，就开了这家餐馆（现在已开成连锁店了）。1979年，正是老布什当美国中央情报局主任的时候，索摩查家族是在他的手下听差的。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的攻势下，他却不得不抛弃他的盟友。美国没有大规模介入尼加拉瓜内战。现在作为小小的补偿，布什来餐馆吃顿饭，为索摩查家族拉拉广告。

如果把索摩查家族看作为美国打工的一族，有时候，大老板罩不住就是罩不住，各人还得自己照顾自己。

这个世界，“各人自己照顾自己，各人有自己的追求”正体现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的伟大。

那天，我下课回到餐馆上班，正在向同事们说跟老布什对话的事，郑生的太太从尼加拉瓜牛肉城餐馆**Los Ranchos**打电话来说，老布什饭后到厨房接见了他们全体厨工。郑生的太太从尼加拉瓜跑到美国后，也是“马死落地行”，从一个吆喝着几个佣人的富贵太太，一下子当了一名厨工。

(13) 各人有自己的追求

我真不明白，这些美国人，放着安闲、优裕的美国国内生活不过，干嘛非得往那些第三世界穷国乱跑？难道，雅致的、文质彬彬的、温良恭俭让的环境就不能有所追求、有所成就了吗？

“各人有自己的追求”，广东话叫做“各人自己执生”。美国人对于这一观念跟我们中国人可能会有点不同。我们曾嘲笑美国人父子之间都没有情意，上餐馆吃饭，父父子子都是各付各的钱。中国是“牛耕田，马食谷，老爸挣钱儿享福”。父母勤勤恳恳为儿女铺好了一条人生的金光大道。结果，儿女连走路跌倒，摔跤都不会摔。以致儿女一失手，就毁了前面几辈人的事业。美国人父子各付各的钱是让儿子负起自己能力范围的那一份责任。同时让儿女有自己的一份追求。

抱着“各人有自己的追求”的精神，新西兰籍的英国登山队员埃蒙德·希拉里1953年第一个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成功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登珠穆朗玛峰？他回答说：“就因为它耸立在那里。”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回答有点像周星驰式的无厘头答案。抱着“各人有自己的追求”的精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下岗以后，和几个人跑到南美巴西亚马孙流域的一条河流去探险。探险途中，他病倒了。他的儿子和跟他一块去的人手足无措。西奥多·罗斯福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管我，继续去探险吧。把我扔在这里就行了。”

美国很多人是“各人自己照顾自己，各人有自己的追求”的。

律师朋友拉里，加州伯克莱分校法学院毕业以后，离开父母，一个人跑到了巴西圣保罗。20世纪70年代，巴西跟今天的中国一样大搞现代化建设，与世界接轨。很多美国人跑到那里去找工作。好像当年毕业后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美国人的边疆就是蛮荒、未开发或者正在开发的蛮荒之地。在巴西，拉里一边学葡萄牙语，一边找工作。干了几年，干到了可口可乐公司驻巴西的法律顾问，在巴西成家立业，跟他的巴西太太生了两个小

孩；后来回到纽约总部。80年代来到迈阿密开办自己的律师行。后来又做起日本和中国的生意。他最大的手笔是跟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签了在迈阿密海滩建一栋大旅馆的协议。我去帮他筹办奠基仪式，日本全日空各级领导来了很多人。仪式过后，他送我一大桶日本清米酒 Sake。可惜，日本的商业房地产热让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的《广场协议》泼了冷水。日本进入了“失去的十年”。后续资金没有到位，全日空迈阿密海滩大旅馆没有建成。拉里从此走了下坡路。我最后见到他的那一次，是他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帮别人打工，案头放着中国牌子的轮胎的推销方案，为中国牌子的轮胎打开美国市场做产品责任评估。

拉里回美国的时候，跟他的巴西太太离了婚。不过，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两个孩子的照片。朋友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拉里有断袖之癖。他的一个男朋友，大卫·龙之根，也是律师，高大英俊，血气方刚，简直就是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塑的模特，却患了艾滋病。在1990年即将到来的那个圣诞，他扯去身上做化疗的所有医疗器械，倒掉所有药品，留下了那句千古名言：“生命不应该是这样的！Life is not like this!”溘然逝去。

我刚来迈阿密时，带我去学校注册的其中一个律师，马克律师，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法学院毕业，毕业后和他太太一起跑到迈阿密找工作，做诉讼律师，业余拼命学西班牙语。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忠诚正直，有献身精神，慷慨大方，助人为乐。帮我注册入学后不久，跳槽回到华盛顿一个大律师行工作；未几，投身美国国务院，常常被外派到拉丁美洲国家。上次收到他的信，说是在危地马拉，帮危地马拉政府做司法系统建设，还寄来一张他刚出生的女儿的照片。

我真不明白，这些美国人，放着安闲、优裕的美国国内生活不过，干嘛非得往那些第三世界穷国乱跑？难道，雅致的、文质彬彬的、温良恭俭让的环境就不能有所追求、有所成就了吗？

(14) 寻找归属的感觉

他们告诉我，如果真有思想问题的话，要去找心理医生。美国人都这样，如果有对生活环境的不适应，想家了，有情绪上的苦闷、孤独和失落，有家庭纠纷，要找心灵的“归属”等等，就去找心理医生。

临毕业前，我跟一个日本同学和她的美国男朋友在学生会谈论日本文化和文化冲突、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山口百惠和高仓健。我特别推崇高仓健的冷峻、坚忍和刚毅的男人性格。这位日本同学和她的美国男朋友是原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汉语的时候认识的，在北京待过一年，他们对北京比我熟悉多了。当时北京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他们约我第二天到迈阿密当地的电台做一个关于中国的专题节目。

第二天，我们到了迈阿密的WNWS790电台，作为嘉宾，以北京突发事件为背景，回答美国听众打电话来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日本同学和她的美国男朋友主要是回答北京的市容和地理环境。电台节目主持人和我主要是回答一些关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党和政府的一些政策、传统文化等问题，如中国的户口制度、档案制度、毕业分配、旅游限制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多人出国留学。留学生放洋，他们对中国的户口制度和档案制度不信任是自我放逐的原因之一，认为这两大制度，约束了个人才能的发挥，使那些自认为是“精英”的人成了“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

中国的户籍制度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以后历代皇朝改朝换代，都以户籍移交作为政权移交的标志之一。对户籍的管理就是天子对江山社稷、对臣民的管理。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赖以生存的制度。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唐纵从德国法西斯警察系统那里搬来了更为完整的户籍制度，由公安局在各个居民区设立派出所，由派出所

掌管居委会和城管组织，全国人民的一举一动尽在掌管之中。解放后，这一户籍制度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哪一家哪一户有什么红白喜事，参军或者入狱，街坊组长肯定知道，肯定管得着。两夫妻吵架，居委会或派出所会派人来劝；闹到离婚的话，街坊组长出面调解，那就更不用说了。时不时，派出所和居委会还会来查户口。我岳父来美国住我们家，就问过是否要报临时户口的问题。我告诉他，美国的居委会是自发组织和由居民区的居民选举产生的，不归派出所管，他死活不信，到现在也不信；就如同我在电台上回答美国听众关于户口制度的提问时，说家庭归居委会管，居委会归派出所管，派出所归市政府管，美国人也是死活不信，“哪能啊？这不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吗？”

美国听众对户口制度和档案制度的反应比较激烈。当听说没有户口本，就不能在北京住，就没有粮票，没有粮食供应，饭都没得吃，他们就不知所措了。当听说没有档案，就不能调单位、不能换工作，大伙儿都说我在瞎说。他们在电台的节目上问，“档案不是自己编写、自己拿着的吗？”对美国的个人档案管理，那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听说是：九年级（等于我们的高一）开始，学习成绩开始算总分平均分作为入大学的参考；个人病历可以到医生那里要回来，自己保管；求职信是自己写的，是工作调动最重要的档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就不一样了，我解释说：“如果原单位拿着档案不放，你就无法到新单位上班；就算新单位给你一个工作职位，你上班了，新单位也不能给你发工资。”所以有不少的人，当年在中国就因为调动工作调动不了，索性跑国外来了。打电话到电台参加我们节目的美国听众对这一档案制度不可理解。而迈阿密的南美人多从拉丁美洲移民过来，特别是古巴移民，对于户口制度和档案制度还能理解。他们认为，这跟他们从拉丁美洲移民美国要搞一个绿卡差不多，搞身份的档案可是连指纹都要记录在案的；而没有合法的身份，就等于没有户口，就不能工作，就没有饭吃，就那么简单。

提问的美国人问：如果中国松绑了户口制度和档案制度这两大枷锁，会怎么样？国家会乱吗？大家的结论是，如果中国放宽了户口和档案对人的控制，滞留在海外的留学人员起码有一半要海归回中国去。

那时候，中国人还有一个旅游限制的问题：不能随便出国旅游。要出国的话，第一，要向工作单位的领导申请，没有工作单位的要向派出所申请；第二，工作单位批准了以后，要向公安局进出口管理局申请护照；第三，要申请签证；第四，是没有钱，没有外汇，因此还要申请外汇，要兑换外汇。不是好像今天那么容易的。美国听众认为，没有钱，不能出国旅游，这比较好理解；有钱就可以换外汇了，是不是？申请护照，那好办啦，到邮局填个表，国务院就会把护照寄家里来了。而去许多国家，美国护照是不用签证的。

对于我这样在国家机关工作过的人，还有一个组织纪律的约束。这一点，我在电台上没有讲，听众也没有问；估计就算我讲了，他们美国听众也不会明白。回想起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和辅导员会安排好一切，连睡哪个房间、哪个床铺都有所规定。而到了美国，一下子就“放了羊”，心里头，有点失落。刚来美国上学的时候，老是想要找领导汇报工作、汇报思想。我跟我们商学院的张孙教授说，我要不要定期向她汇报一下，她一脸茫然，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后来，她要我到他们家参加他们的教会查经班——《圣经》学习小组。我跟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校长助理托马斯也说了汇报思想的事。他好像听懂了一点。他要我每周两个中午去教他学汉语，他每周付我40美元，并请我吃午饭。他还像带研究生那样，每星期给我一批书目，让我去读一些书，并写书评，然后向他汇报。名义上是要我帮他做研究，兼教他汉语；其实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明朝对外关系的，汉语根本不需要我教。他只是想用自己的钱，尽自己的力，帮一帮我，使我有那种“找到了组织”，能“汇报工作”的感觉。用他的话说，“I know you are

struggling, you are swimming. Swimming is OK, but don't sink.”他不想看着我沉下去。然而，我还是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组织”。

他们告诉我，如果真有思想问题的话，要去找心理医生。美国人都这样，如果有对生活环境的不适应，想家了，有情绪上的苦闷、孤独和失落，有家庭纠纷，要找心灵的“归属”等等，就去找心理医生。

“找心理医生”？这挨得上吗？

小时候看着到处写着的标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些都是些组织纪律。久而久之的熏陶，养成了一种严格要求自己的自觉性和一定的组织纪律性。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素质，但这正是一个人独立处世所必要的。

现在，我明白了，没有了户口，没有了档案，没有了旅行限制，没有了组织纪律，没有了一切约束，我要找的“组织”就是我自己，一种控制自己情绪和心态的能力。依靠自己吧，现实一点，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能抓到什么机会就抓什么机会。在充满竞争的环境里，找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守住自己的阵地，尽自己的责任，能为周围的人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那个体制。

就这样，我毕业了。

(15) 推销

美国有句话，“人人都有东西要推销。”小贩卖瓜菜，老师卖知识。没卖过东西的话，在美国做不成事，做不了人。

毕业了，首要的是把学生签证变成工作签证。因为有很多的公司是不帮转身份的，哪个公司能帮我搞身份，我就去哪个公司。结果毕业的那个星期，我就去了一个不发工资，但可以帮搞身份的人寿保险公司。

1999年，克林顿政府向国会提交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要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监督和调控。一是银行可以全面跨州、跨国经营；二是银行可以经营保险业务，当时花旗银行和旅行者保险公司合并轰动一时；三是推行投资银行模式，高盛等投行迅速自我膨胀；四是实行资产证券化，任何金融机构都可以发放金融衍生产品，后来造成房地产泡沫。美国国会批准了这一法案。

然而在这之前，银行是不得做保险生意的。银行是银行，保险公司是保险公司。那时候的人寿保险公司动不动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我去的那家也是老字号，有差不多160年的历史。大家知道了，卖人寿保险和医药保险的工作是没有工资的，收入全靠佣金。有客户，卖出去保单了，就有佣金；多卖给几个客户，就多收佣金；卖不出去，就没有收入。客户怎么来？第一，是找熟人，从熟人中找客户；做“黄皮树鹌哥”——不熟的不吃。第二，是拿着电话本，到处给人打“冷电话”（cold call）。亲戚朋友中，最怕是有人做卖保险的，像冤魂一样整天追着你，咒你死。因此，劝说亲戚朋友和熟人买保险，难度比较大。不过，与“拿着电话本，到处给人打电话”相比，难度还是小一点。打“冷电话”根本就没理你，一听说是卖保险，“咔嚓”就把电话挂了。

我们的经理，美国人唐Don不断地给我们上课，作为总公司南佛罗里达州地区经理，唐经理经验丰富，财大气粗，在海边有一栋非常

漂亮的房子。他鼓励我们说，他父亲原来在印第安纳州一家工厂上班，家里穷了一辈子，而今天他出人头地了，靠的就是努力工作。他说，销售或搞产品推销是最难的一项工作，但是也是最能锻炼人的。美国有句话，“人人都有东西要推销。”小贩卖瓜菜，老师卖知识。没卖过东西的话，在美国做不成事，做不了人。而卖保险是推销工作，是难中之难。他对我们几个打“冷电话”找客户的新手做职业心理辅导说：让顾客给挂了电话，让人骂了，千万不要生气，那不是骂你，那是骂保险产品。总之脸皮要够厚，让人骂了，还得夸奖骂你的人几句。嘴要甜，要多说好话，要让拒绝你的人，或骂你的人，自己感到内疚，而继续听你的推销。

刚上班的那几个星期，白天上班，就是上课、看材料、读书和准备考执照，什么保险执照啦，股票经纪执照啦等等。下班以后和周末，就是给人打电话，找客户；欠揍，要找人骂。

我这人，脸皮够厚的，别人怎么骂，我倒是无所谓；但是杀气太重，嘴怎么甜，人家听起来都像黄世仁追债似的，别人心里面不舒服。这辈子，怎么学，怎么装，别人总会感到我那咄咄逼人的锋芒。“大石压死蟹”，太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了。姜太公钓鱼，用的是直钩，愿者上钩。让我钓鱼的话，要不就是用炸药炸，要不就是把鱼塘的水抽干了，然后抓鱼就是了。

找了几个有条件要买保险并且正想买保险的熟人，向他们做工作。

人寿保险分两种，一种是“定期人寿保险（Term Life）”，买了，死了的话，保险公司赔钱；不死的话，保险费没有得要回。另外一种“普及人寿保险（Universal Life）”，是有储蓄功能的，买了，死了的话，保险公司赔钱；不死的话，交出去的保险费能要回相当部分。卖保险的保险经纪人靠的是后一种，因为有储蓄功能的普及人寿保险金额比较大，相对的佣金比较多。因为它的储蓄功能，最后投保人能拿回的钱也相当可观。

正当我苦苦抓客户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一条大鱼。沈先生请我为他们公司介绍一下我们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产品。

沈先生是在“中国贸易圆桌会议”上认识的，美国生物学博士，下海搞海水养殖和鹅肝酱。两个项目都是在国内合资，海水养殖产品销到美国，鹅肝酱销到法国。他搞了三年，生意不是很好，一直在亏本。主要是整个生意模式曲高和寡，有点不切合市场实际需求。他便放弃了生意，在罗德代尔堡找了一份工作。

他工作的公司是当地的一个生产毛巾被服的将要被淘汰的工厂。美国纺织行业几乎所有的生产日用纺织品的工厂都关掉了，都被中国打垮了，都搬到国外去了。这是一个正在找出路的公司。

沈先生被聘为副总裁兼市场部经理，帮公司找出路。20世纪90年代，生意上进出中国的路子几乎都让香港给垄断了。中国生意没得做，沈先生跑到了东欧和俄国，先是销售，后来把部分生产设备搬去了俄国搞原料加工。

这时候，他们公司在美国有五六十人左右。太好了，如果他们能买我们公司的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我就可以有收入了，有可能就能在这一行立稳脚跟了。

那天，我们公司唐经理和我一块去做产品介绍。他们公司所有的领导都到会了。其中一个管人事和福利的女性副总裁说：她早听说我们公司了。

一切顺利得出乎预料。我正想如何签合同（close the deal）的时候，那位女性副总裁打电话给我们公司经理，提了一个要求，说是她的外甥米切也在我们公司工作，这个生意要我跟米切平分，把佣金分给他一半。我只好跟公司唐经理和米切重新协商。这样又拖了一个月。我决定忍痛割利，分给米切一半。可这时，他们公司的俄国合资人要求把整个工厂搬到俄国，美国只留5个人。这样他们就不要我们公司的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了。

这个生意没有做成，其他熟人的生意也没有做成，保险、股票经纪等执照倒是都考过了，工作签证H-1也下来了。我开始找别的工作。饭总得吃吧？

现在回想起来，也幸亏没有入了卖保险这一行，克林顿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施以后，第一，银行加入了保险业竞争，竞争一下子就白热化了，很多百年老店的传统保险公司就垮了。我们公司也让银行吞并了。公司唐经理，退休又差一点还不够年龄，小孩在上大学，正要用钱。他只好从罗德代尔堡跑到迈阿密来上班，当了他原来手下职员的一个部属。由于他也不懂西班牙语，他也在职场上苦苦挣扎。第二，金融行业搞出了一大堆新的投资产品，什么“房地产抵押债券”，“信用违约掉期”等等，有储蓄功能的“普及人寿保险”等保险产品就没有了市场。这使得卖人寿保险的经纪人，生意越来越难做。

(16)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覆灭

悬。幸亏他们没有要我，也幸亏我没有去那银行工作。

在迈阿密找工商企业管理金融工作最难的是，几乎所有的相关工作都要求懂西班牙语。说英语还能凑合，说西班牙语，有点免为其难了吧？工商企业管理硕士，加上几个金融行业的执照，不会连找一个说英语的工作都找不到吧？这还是不是美国呀！再说了，我的要求就是一份年薪两万美金的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又不是6位数的年薪，这样我可以为自己办一个绿卡。

一边卖保险，一边打餐馆工，一边找工作。

律师事务所的熟人把我推荐给了几个单位：一个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所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分部，一个是美国银行的另一个前身——北卡罗来纳州国民银行在迈阿密的分部，还有一个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我发的求职信，前面的那两个单位一下子就把我拒绝了。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打来电话，叫我去面试。能到一个世界顶级银行面试，我高兴得不得了，几个晚上没睡好觉。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美国总部就在我们律师事务所对门的大楼里。律师朋友带着我去面试，直接见了他们的副总裁和人事部经理。他们口头上说“没问题”，很有可能要我了。其后我等了几个星期，却一直没有收到他们银行的录取信或拒绝信。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多年以后才知道，原来，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等单位正在查封该银行。

美国调查单位发现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有大量的离岸资金脱离美国政府的监控，用作资助一些伤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

离岸资金实际上一直受美国政府监控，但是美国政府对离岸资金没有国际法意义上的管辖权，加勒比海上的那些岛屿大多是英属、法属、西属或葡属。对离岸资金养成的对冲基金，美国政府也没有法律管制。很明显，美国政府的態度是，只要你不侵犯了美国利益，你想

怎么着就怎么着好了。如果你侵犯了美国利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在卢森堡作公司注册，在英国设立银行总部。20世纪80年代高峰时期，在78个国家有四百多个分行（包括在中国北京的分行），资产超过200亿美元，为当时世界上第七大银行。银行由巴基斯坦人创立，资金来自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是世界上圈外第一个契入盎格鲁萨克逊人主持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私营银行。美国的总部设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坐落在著名的“拉丁美洲华尔街”的布里克尔大道。

冷战结束以后，盎格鲁萨克逊人主持的西方意识形态突然发现，与其价值观最为冲突的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恐怖分子不但不承认和不接受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而且动不动就用暴力解决分歧；使用人肉炸弹、自杀攻击等等。而全球金融体系是西方意识形态最坚强的最后堡垒；因此，美英等政府绝不允许伊斯兰的血腥恐怖的游戏规则侵入到他们的金融圈子里面分一杯羹。

1990年，美国与英国的司法单位开始起诉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洗钱、贿赂、支持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核技术走私、逃税、非法移民和非法买卖银行、房地产等项罪名；发现该银行拥有伊拉克总统侯赛因、巴拿马总统诺列加等人的账户；最后把该银行的股东和领导人赶尽杀绝。所有嫌疑人，非死则投入监狱，所有财产没收。

悬。幸亏他们没有要我，也幸亏我没有去那银行工作。

当然，我们也无法预知，后来伊斯兰极端分子会以恐怖主义手段进行报复。1993年，当美国调查单位查封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快要结案的时候，恐怖分子爆炸了纽约世界贸易大厦。2001年，“9·11”事件，恐怖分子彻底炸毁了纽约世界贸易大厦。开飞机撞楼的那两个人就是在迈阿密接受飞行训练的。19个劫机者之中，有15个是沙特阿拉伯国籍，2人是阿联酋国籍，国际商业信贷银行被没收了的钱是他们的。“你砸我饭碗，断我财路，我跟你拼了！”现在我们都知道，恐怖

分子为什么非要跟纽约世界贸易大厦过不去了，因为它象征了盎格鲁萨克逊人主持的全球金融体系。

我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7) 高级打杂

到保险公司当会计。我高兴得不得了，赶紧去书店买了一本关于如何做秘书的手册。我知道，工商企业管理MBA毕业当一般会计，没有问题；关键是公司的方方面面都要会做。说明白了，就是一个打杂的，应该跟在餐馆当打杂没有什么区别。我是抱着这样的心理去上班的。

我去见了几份工，过了几个月，布莱恩，承保人担保保险公司的财务总监，打电话来说，公司决定要我；到保险公司当会计。我高兴得不得了，赶紧去书店买了一本关于如何做秘书的手册。我知道，工商企业管理MBA毕业当一般会计，没有问题；关键是公司的方方面面都要会做。说明白了，就是一个打杂的，应该跟在餐馆当打杂没有什么区别。我是抱着这样的心理准备去上班的。

承保人担保保险公司是一个小公司，年营业额大约5000万美元，员工差不多100人。主要经营汽车保险，是直接开保单的公司（underwriter），不是经纪行。

美国保险业分两大部分：一部类是人寿医疗保险；另一部类就是财产灾难保险，承保人担保保险公司是属财产灾难保险这一类。保险会计是一个非常专门的行业，又叫成文法会计（Statutory Accounting），或叫保险专业会计。它跟一般的金融商业会计不同：第一，有精算部分，用精算数据作为定价和会计指南。第二，由州政府严格控制公司的资金流动；公司收到客户的保险金不能随使用，要预存相当部分现金在州政府指定的银行账户上，一旦有灾难，公司又不景气，索赔的客户能从州政府指定的银行账户上理赔拿到钱。收取客户保险费多少也要州政府批准。

干了几个月，基本熟悉了公司的工作和人事。公司大老板里克，意大利移民，20世纪50年代从纽约跑到佛罗里达，开了这家保险公司。60年代，他首倡“无论对错保险（no fault insurance）”。无论投保

人是否要对车祸事故负责，保险公司都照赔损失不误。他的主意来自美国各州婚姻法上的“无过错离婚（no fault divorce）”，要离婚就离婚了，无论谁对谁错，把小孩和财产分了就得了。“无论对错保险”使公司大老板里克名声大噪，公司也赚了不少钱。公司大老板里克是远近有名的好人，知人善任，出手大方。

人无论男女，发了财就离婚、泡二奶或包二爷。里克后来再娶。结果，里克、他现任老婆、现任老婆跟前夫生的女儿、里克跟他现任老婆生的女儿，一家四口都在公司上班。公司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高级管理层办公室，另一部分是各部门集中在一块的大办公室。高级管理层办公室有老板、老板秘书、财务总监、财务总监助理和我。老板娘镇守各部门集中在一起的大办公室。凡是这么一家子人都在一个公司上班的，特别难侍候。全世界都一样，夫妻档搞不大，搞大了的话，没有不散伙的。

有一天，我突然被加薪，加了40%，并被升职为财务总监助理，分管保险专业会计、再保险和股票债券投资。原来的财务总监助理被炒了鱿鱼。原来的那位是从专管我们公司审计的事务所跳槽到我们公司来的，熟悉我们公司工作已经有5年了。被炒的原因是她把老板小女儿的一些私事传去了各部门大办公室，弄得满公司是是非非。

没想到，我在这个财务总监助理的职位上，一干就干了好几年。在州政府允许的范围内，为公司买卖了不少房利美、房地美的MBS、CMO等房地产贷款衍生金融产品，炒了不少股票。特别是对再保险业务比较熟悉，对保险专业会计的关键运作和计算如“发生了但又没有入账IBNR”等也比较熟悉。自以为在保险会计这一行干到退休没有问题。

那几年，除了上班以外，还做了几件事，家里买了房子，生了两个小孩，拿了绿卡，拿了注册会计师执照。

(18) 保险公司之乱局

没有一两个专业执照，在美国根本没法混。

布莱恩，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对我拼命考注册会计师CPA执照不以为然，不理解也不支持。“干嘛了？我尽我所能，已经把你提拔到仅次于我的位置了。”这个位置再要升，就升到他的位置上了，那么要他要我，公司就不好办了。如果不升职加薪，拿了注册会计师执照，他怕我会跳槽了。

考注册会计师执照是我来美国之初就决定了的事，要不就考律师执照，要不就考会计师执照，没有一两个专业执照，在美国根本没法混。“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因此，第一是要正名，第二也是要正名。在美国，你可以随便注册一个公司，你可以任命自己为总裁，首席执行官，别人也可以任命你当主席，当伟大领袖；也可以找一个大学搞一个“执行工商企业管理硕士Executive MBA”的文凭。但是专业执照是要一个一个地去考的。

如果要我像布莱恩那样，只求保住这么一个公司的财务总监的位置，在一个破地方，在一个小行业涮来涮去，倒不如让我回中国参加西部开发。

最令布莱恩不满的，说是我对公司不忠诚；有效率，但没有承诺。这话怎么说？第一，工作只是工作，不向公司交心，不当公司同事是自己人。第二，一项工作，明知道是错的，只要是上级交代的，按上级意图照做不误；错了是上司的责任。我知道我就这样了，可以说是缺点。但是我们俩当时都不知道，原来全美国都一样，都持同样的工作态度，这叫做“咨询合同工工作态度”或“咨询合同工症候群”。公司不必把我们当人看待，把我们看成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就成了；想往哪里拧，就往哪里拧；用完不用了，把我们扔了就得了。至于，下回我们会被谁看上？又被拧上哪一部机器？我们自己拿主意。如果想像过去那样，搞山头、走后门、搞裙带关系、吹牛皮、拍马屁、擦

鞋，在同一个行业的同一个公司一级一级往上爬，恐怕得投过胎，或是早出生30年。

布莱恩，一个旧公司体制最后卫道士，德裔美国人，继承了德国人严谨，精细，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他是注册会计师，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被我们大老板招到公司当财务总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对大老板和大老板的公司鞠躬尽瘁。对大老板的知遇之恩，他涌泉相报；像一个二奶一样，低声下气忍让于大老板和老板娘的权力斗争之间，一直坚持到公司倾覆，才转到一个小一点的保险公司继续当他的财务总监。

我考到了注册会计师执照的时候，公司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式的权力斗争，布莱恩没有为我庆祝，倒是做我们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帮我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

公司的权力斗争是从老板被检查出食道癌开始的。大老板开始半退休，只上半天的班了。老板娘主政。老板娘是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人。她矛头直指走大老板道路的当权派，首先把大老板的司机给裁了，由她自己开车带大老板上班。然后把大老板的秘书裁了。再下来，就是把自己的一个老同学和跟随老同学一块的那拨人全裁了。这位老同学是老板娘的中学同学，为公司做承保，工作了几十年，一直是公司的顶梁柱；由于知道老板娘的事情太多，与老板娘一家太熟，常常会与老板娘有点小摩擦。大老板在的时候，不知道为调解她们俩的矛盾费了多少心。现在大老板半退休了，她就把自己的老同学给裁了。大老板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对公司人事任免不予置评，任由老板娘处分。

老板娘之所以乱裁员，是她相信公司做成目前的规模不赚钱，要不就把公司规模缩小，要不就把公司规模扩大，否则，公司光有营业额却纯利不足。老板的未来女婿是在一家投资银行搞并购的经理。他雄心勃勃地在幕后给老板娘策划公司的未来，说要把公司整理好，然后IPO上市。

老板娘还把布莱恩财务总监的小蜜（秘书）给裁了，“这么漂亮的女孩儿，叫你来上班，还是叫你来做秀呀？”作为正人君子，布莱恩从来没有对小蜜有非分举动，只是与她聊天说话会多一点，或请她去吃吃午饭而已。小蜜后来嫁给了一个无业游民，小孩还没生下来，便又离了婚。布莱恩也离婚了。我倒是希望布莱恩把他的小蜜给娶了。

下一个，老板娘就把目标对准了我和信息计算机系统主任。

对付我好办呀！我刚度假回来，给我多发了两个星期的工资，就让我滚蛋了。话又说回来了，老板娘什么时候把我和其他员工当自己人啦？是你布莱恩财务总监自作多情了。

要命的是，这是圣诞节前夕，再找工作就不好找了。这害得我措手不及，匆忙去申请了失业救济。这是我在美国工作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当然不是最后一次。救济金每月一千多美元。在美国领取失业救济金还算方便。只要公司发一封辞退信，说明辞退的正当理由：譬如，公司生意不好，造成该员工工作量不足等，而不是该员工自行辞职的，被辞退的员工就可以拿到救济金。

公司在没有人接手的情况下，把信息系统主任裁了，就等于让公司瘫痪了。这可得再想一想。信息系统主任被盯上的原因是他有个性，恃才傲物，人缘不怎么样，平时顶撞老板一家人多了点。

我被裁员以后，在领取救济的同时，到处找工作，好不容易去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给一个客户做审计，刚好与老板的未来女婿同在一个大楼上班，就是迈阿密市中心最高的那栋第一联合国民银行大楼。我多次去他的办公室聆听他改造承保人担保保险公司的宏图大略。他反复问我信息系统主任是Asset还是Liability？是有用之才，还是公司的累赘负担？我不敢妄言，只是把他的问题和议论一一汇报给布莱恩财务总监。其实那时候已经没有我什么事了。幸亏，我死活弄了一个注册会计师执照，这个饭碗丢了，还能捧起另外一个。否则的话，我就会像满街的工商企业管理硕士一样，到处晃悠了。

然后，信息系统主任就被裁了。再然后，大老板癌病死了，公司又熬了两年就散伙了。老板的未来女婿没有把公司搞IPO上市，也没有跟他们的小女儿结婚。

(19) 中国留学生的圈子

很多人是双博士：PhD + MD哲学博士加医学博士。某些人是MD + JD医学博士加法学博士。拿这么多高尖学位，一方面是本身就是读书人，另一方面也有搞身份的原因；转身份转不成，只好继续待在学校里读书，保住一个学生签证或交换学者的签证。

一个人无论他如何自立，他都会自然而然地去靠上一个让自己的感情安身立命的归所，特别是在职场如战场，商场如战场的今天。这个感情安身立命的归所应该与职场和商场彻底割裂开来，无论在职场上，是一个怎么样统御千军万马的主帅，在这个归所里都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一兵；无论在商场上，是一个怎么样腰缠万贯的亿万富翁，在这个归所里都是一个谦卑自律的一员。

作为中国留学生，我们家自然靠上了大陆来的中国留学生的圈子。在迈阿密戴德兰广场附近，美国一号公路和北肯戴尔大道交界的地方，在20世纪90年代，大陆来的中国留学生陆续聚居形成了一个“大杂院”。住在那的许多人都在迈阿密大学上学，他们的家属就在附近打工。

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在数学、物理、化学等系，以及海洋学院和医学院。

当时最多的话题就是毕业找工作和来陪读的家属打工的事，以致形成以后个人的生活经历大不相同。原来上学有助学金的人，找工作比较顺利的人，一下子就待在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工作单位，以后20年工作生活都没有变化。原来的风云人物，学生领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和家庭的变迁以后，都归于沉寂，悔恨自己把青春岁月都荒废在充充场面和一些自发组织的权斗上。在美国的华人圈子里面，有一个现象：几个人就成立一个什么什么组织，互相封官许愿；其实是鱼水翻滚鱼塘，小池塘里来来去去就那么几条鱼在兴风作浪。相比之下，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比较大的一群是医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走着一漫长却稳步前进的路，从博士到博士后，到住院医师，到医生自己开业。很多人是双博士：**PhD + MD**哲学博士加医学博士。某些人是**MD + JD**医学博士加法学博士。拿这么多高尖学位，一方面是本身就是读书人，另一方面也有搞身份的原因；转身份转不成，只好继续待在学校里读书，保住一个学生签证或交换学者的签证。

海洋学院也有一拨非常专业的人才。著名的美国国家飓风预报中心就在附近，有些人一毕业，就到了该中心工作。

迈阿密的中国留学生后来找到工作的大多是理工科学生转行搞计算机的。搞计算机起码不要求懂西班牙语。结果是，不管原来读的是什么，大家都争着改行搞计算机了。

但是也有例外。

朱同学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到迈阿密陪太太读书。太太搞环境保护，毕业后在当地找到了工作。朱同学就陪着太太在迈阿密谋生了。迈阿密有一个地方叫“椰子林”，是一个游客如云的旅游景点。朱同学带上绘画的工具到这里摆画摊，为游客画漫画，就像法国巴黎蒙马特尔高地或塞纳河畔的画摊那样。别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工作，但对工作者本身却颇有压力。第一，在没有上级领导督促的情况下，工作者本人要非常自律，要按旅游季节和游客的规律去上下班。第二，赚到的收入要平均使用，把多挣的钱存下来，以备没有收入的时候用，而不是一天挣了一万块，第二天就用光了。第三，在这种几乎是不规律的工作中，寻求事业上的发展。

朱同学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会创作一些画，放到艺术画廊寄售；另外还接一些名人的肖像画和广告美术活回家干。

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好。作为艺术家，老朱告诉我，他激情来时，三天三夜不睡觉，拼命创作；没有灵感的时候，一睡就睡三天三夜。

我不是搞艺术的，所以老琢磨一个问题：患了忧郁症怎么办？永远都是一个人的工作环境，不会感到太寂寞吗？

有一对南京来的中国留学生夫妇，丈夫洪医生是搞中医的，洪太太做进出口贸易，主要是从中国进口鞋到迈阿密卖。洪医生非常有生意头脑，先是办了一个太极武馆，又开了一家中医诊所。除了针灸、推拿以外，他发现当地人因肥胖引起糖尿病、高血压等病不少。他自创了一个专门治疗这一类病的综合配方，到国内采购了大量中草药，把中草药提纯，研制成粉末，运到美国来，在美国加工成中成药，广为推销。该药兼有减肥和治病双重功能。一时间，洪医生在当地美国社会名声大噪，顾客盈门。

洪太太做进出口生意，和一个从纽约来的中国人合作。这个中国人是从福州来的，曾经是第八大道上最大的中国鞋进出口商，在国内有几家制鞋工厂，由他弟弟管理。由于不懂得美国做生意的行规，公司不赢利，还欠了一屁股债，最后公司和个人都破了产，跑到迈阿密躲了起来。洪太太收留了他，和他合作。从纽约引进了从中国进货的生意门路，货到90天以后才付款，进货条件非常优厚。把中国的鞋经过迈阿密转口到中南美洲，生意做得非常好，钱也挣了不少。赚了几年以后，就把公司关了。

也有从计算机工作改行，下海做生意的。肖同学原来一直做计算机工作，并且一直兼任中国留学人员社团的工作。有一天，一个社团的人约他一块创办一个做房地产贷款的公司。结果公司一办起来，生意一发不可收拾，刚好站在了房地产热那股风口浪尖上，让他着着实实地赚了一把。

还有一个做假发生意的，从中国进口人造头发到迈阿密卖，专门卖给黑人。这在迈阿密那可是独门生意呀！迈阿密黑人不多，但是有黑人。黑人没有头发，却男男女女都挂着一头卷成一条条的怪怪的头发。那些都是人造头发，是用胶水粘上去的。而中国成为了这些假头发的最大制造国和出口国。迈阿密的黑人都来光顾这位中国留学生。10年的钱挣下来，他们家买了3套房子。

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迈阿密中国留学生的社区不大，也成立了一个社团“南佛州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协会”，办了一个中文学校。我也为这个社团服务过。1997年的时候，我们这个社区搞了一个迎接香港回归的大型晚会，把中国相声艺术团姜昆、戴志诚等人都请来演出了。我们自己也有节目，算是跟姜昆同台演出过了。

(20) 华人社区

那位牙买加华裔同学玉树临风，一表人才，长得极像濮存昕；是会计师，也是选美的评判之一。广东姑娘夺得迈阿密华裔小姐以后，他立马展开爱情攻势，不久就追求成功，喜结连理。

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在迈阿密也有一个很大的社区。台湾在世界上有30个邦交国，其中15个在迈阿密附近的加勒比海地区，所以台湾对迈阿密比较重视。自从美国跟台湾断交以后，台湾的产品加紧了向中南美洲开拓市场。20世纪80年代，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附近，台湾人建立了很多公司。“台湾中华民国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驻迈阿密办事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搞了一个很大的社团“台湾商会”，把台湾来的中国人都团结在周围。我参加过他们的几次活动。他们的社团每个月搞一次讲座。大陆中国人被邀请作为演讲嘉宾的有杜克大学政治系的史天健（史太太是台湾人）和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计算机系的孙博士。史先生讲中美关系，没想到台湾人会听得津津有味，那时候正是李登辉执政时期，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十分紧张，在迈阿密，大陆人和台湾人的关系却一点也不紧张。另一位北京人孙博士被台湾商会奉若神明。他帮许多台湾公司建立起了电子商务系统。台湾公司的人一直把孙博士介绍到王永庆的家族里面，搞到孙博士在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三地来回工作，跑了好几年。

迈阿密还有一拨从牙买加来的中国人。大多数中南美洲国家都讲西班牙语，牙买加是个例外。牙买加的官方语言是英语。牙买加来迈阿密这个西班牙语环境的中国人一下子像到了一个孤岛，找不到组织，没有组织生活过，十分郁闷。有一位原来台湾外交官的儿子，跟我是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商学院的同学，他找到了美华协会，说是要创立美华协会南佛州分会。美华协会马上授权他成立南佛州分会。分会会员很多是美国出生的华裔和只说英语的华裔。他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理事会会议，全套程序按美国习惯，用英语进行，什么“motion”，“I

second”，“motion granted”等等，跟其他社团开会的程序大不相同，倒是跟美国的公司开董事会差不多，绝对符合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标准章程。那一次理事会会议上，他们决定参加赞助安良工商会搞的迈阿密地区华人华裔选美活动。

迈阿密第一届华裔选美冠军——华裔小姐，由一个刚移民美国不久的广东姑娘获得。迈阿密这样华人华裔稀少的地方也搞华裔小姐选美，我大感惊讶。更不知道那些评判是持什么样的审美标准？中国的美女首推大连、青岛，苏杭一带也有些“沉鱼落雁”、“羞花闭月”的，最近是推崇成都、重庆的美女。广东女孩选美夺冠的好像没有听说过，迈阿密的那一位，不知道算不算开了广东美女夺冠华裔小姐的先河。我那位牙买加华裔同学玉树临风，一表人才，长得极像濮存昕；是会计师，也是选美的评判之一。广东姑娘夺得迈阿密华裔小姐以后，他立马展开爱情攻势，不久就追求成功，喜结连理。

说在美国混饭吃，不知道怎么就说到选美了？

对了，那位广东美女夺冠以后，有记者采访她夺冠以后的感想。她说其实很多人都有夺冠的潜质，首先是要大胆展示自己的潜质：如身材、风度和仪态；相貌嘛，是次要的。

怎么会说到华人社区的事呢？

(21) 江湖码头

说话间，有一个美国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扛着一盘牛扒，跑进办公室，问酱油放在什么地方。朱老伯马上跟我们做了介绍。那人给了我一张名片，是当地一家有名的银行的资深副总裁。

我觉得，在美国混饭吃，连自己在一个什么地头、什么江湖都不知道，有点太说不过去。再者，在西班牙语的地盘混，一旦被裁员，找不到工作的话，能不能在华人华裔之中发展客户？能不能自己注册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做会计报税等生意？迈阿密的华人华裔圈子，是否足够大到支撑我的会计师事务所？单做华人华裔生意，工作兴趣如何？是否喜欢？自己是否受欢迎？带着等等这些问题，取得注册会计师执照以后，名正言顺了，去拜一拜码头。

有一天，“OK陈餐馆”的老板，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朱姓广东台山老伯。朱老伯在当地开了一家肉类海鲜批发公司，主要供应中南美洲南美人餐馆，也供应中餐馆。朱老伯邀请我去他公司谈谈。

我从来没想到一个肉类海鲜批发公司能有如此的规模，一个三层楼的大仓库，门前有十来辆大货车。办公室在三楼。推门进去，我首先自报山门。朱老伯和他的儿子从里面的办公室出来，把我让进了里面的办公室。因为是四邑同乡，大家用台山话交谈。

朱老伯首先表明自己热爱新中国，并和台湾势力划清界限。我当时并不知道，迈阿密还有一拨比台湾商会更大的台湾势力，更不知道朱老伯与这拨台湾势力的领导人有个人恩怨。然后是朱老伯的儿子朱后生跟我用英语谈。美国出生的朱后生是迈阿密县的议员，说是迈阿密县政府继组成了古巴人和妇女两个顾问团以后，现在有意成立亚裔顾问团，作为功能团体给政府处理亚裔事务提建议和出谋划策。朱后生说，提议成立亚裔顾问团是县长政坛大帅哥亚力克斯·佩雷拉斯提出来的。全县有9位县务委员，每位县务委员可以推荐两名政府亚裔事务顾问。亚裔事务顾问是不受薪的。为了不让名额落到台湾势力的手

里，他要先把这个事跟我说，看我是否有兴趣为县政府服务，为迈阿密的亚裔社区服务？并说，他是代表县务委员彼得罗·里伯拉多跟我谈的。

没想到，拜码头，一拜就拜到了迈阿密县政府。

这事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大一点，我得想一想。

说话间，有一个美国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扛着一盘牛扒，跑进办公室，问酱油放在什么地方。朱老伯马上跟我们做了介绍。那人给了我一张名片，是当地一家有名的银行的资深副总裁。原来办公室后面连带有一个公司的餐厅，有一拨政府官员和商界老板正在自己做饭，自己吃；看样子，他们是这里的常客，自来自往，像自己家一样。看来朱氏父子他们家在迈阿密政界商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那些人常常跑他公司来吃吃喝喝，好像不是美国政客的规矩，倒是跟中南美洲的规矩更为接近。

(22) 政治生态环境

要不他们刚好因贪污腐败，在自己的国家被双规，逃到迈阿密来了；要不他们有刑事案件在身，正在被国际刑警追捕；要不他们原来就是黑白两道通吃，来迈阿密，是因为他们正在吃黑道，比如：收保护费、雇佣杀手等等；要不他们已经厌烦了他们的名气和财富，来迈阿密，正是要放弃一切，回归自然，做一个平民，甚至把衣服脱光了，做一个乞丐。

得说一说迈阿密的政治生态环境。

如果你在迈阿密的大街上逛，你碰上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一个外国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或是商界的头面人物，或是各国明星等等；但是，你千万不要点破说：“我知道你是某某名人”，或者要求签名留念。因为，在迈阿密大街上逛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只是一般的游客，来这里玩的，或者打酱油的——路过；就算真的是某某名人的话，此刻，他们所处的角色刚好是处在与他们名人的角色相反的那一面。

这话怎么说？

要不他们刚好因贪污腐败，在自己的国家被双规，逃到迈阿密来了；要不他们有刑事案件在身，正在被国际刑警追捕；要不他们原来就是黑白两道通吃，来迈阿密，是因为他们正在吃黑道，比如：收保护费、雇佣杀手等等；要不他们已经厌烦了他们的名气和财富，来迈阿密，正是要放弃一切，回归自然，做一个平民，甚至把衣服脱光了，做一个乞丐。

君不见，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在维斯卡雅小区有一栋房子；意大利超级时装设计师范思哲在迈阿密海滩也有一栋房子，他长期住那房子，却在屋里面被他的同性恋朋友给杀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在迈阿密比斯坎岛有一栋房子，他回来度假的时候，雇了几个迈阿密的人，并策划

了“水门事件”。那几个迈阿密人跑到华盛顿水门旅馆的民主党总部，去偷尼克松的竞选对手的竞选策略，后来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

那么，面对亚裔事务顾问的提名，我在想什么呢？

县务委员彼得罗·里伯拉多是由迈阿密县第6分区选上当县务委员的。他分管的是第6分区，大约等于北京的西城区，天安门、中南海归他管。迈阿密的海牙利亚市、小哈瓦那、国际机场和珊瑚墙市归第6分区管。对了，美国的行政区域划分是州管县，县管市，以县带市，不像我们中国的以市带县。第6分区管不了辖下的珊瑚墙市就好比西城区管不了中南海一样。珊瑚墙市里面住的都是牛人。

不过我们做的是亚裔事务，跟珊瑚墙市里面的牛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所以我就答应了提名。

第6分区提名会议，在珊瑚墙市的图书馆里召开，我把我的身份资料交给了县政府的秘书，做了提名的注册登记，然后就是讨论亚裔事务顾问团的章程。会开完的时候，秘书走过来问我是不是美国公民，我说“不是，只是绿卡”。她说，根据法律规定，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在县政府任职。旁边的律师和县务委员听了以后，商量了一下，说是要回县里的议会大会上，修改一下这一条法律。不可能吧？“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在县政府任职”的话，迈阿密政府肯定没有人做事。迈阿密是三分之一游客或非法移民，三分之一绿卡，另外三分之一才是美国公民。

果然，他们为此把这一法律给改了。他们说，这又不是修改美国的《宪法》，改这么一个法律，小事一桩。

就这样，我被县政府任命为第一个亚裔事务顾问，给我发了一个委任状，任期两年。当然那是没有薪金报酬的工作。那时候，我还在保险公司工作，公司在搞夺权斗争，但是还没有把我裁掉。

(23) 美国公务员

(23) 美国公务员

美国当官是很一般的。大多数人是赚够钱了，才来竞选公共职位，过一过“为人民服务”的瘾。

大家知道，在美国当公务员，或政府官员，为政府工作，跟国内有点不一样。在国内当官总算是有点追求。但是，美国当官是很一般的。大多数人是赚够钱了，才来竞选公共职位，过一过“为人民服务”的瘾。美国也有当官为了挣点名气的，挣点明星效应，以便下台以后，凭着当过市长、州长，转到大公司里面赚大钱的。迈阿密的县长、政坛大帅哥亚力克斯·佩雷拉斯，在台上的时候，由于跟副总统戈尔有点过节，被戈尔在媒体上公开点名批评；下台以后，被政界抛弃了，到了一个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

我上任以后，其中一个工作就是了解选区里面的民情。

说起亚裔各国政要退休后聚居地，迈阿密跟华盛顿没有得比，但也有些要人聚居在迈阿密。跟他们见面，我从来没有亮出过我在县政府工作的身份，因为跟他们过去的职位相比，这真的不算什么；我只是自我介绍说，我从大陆来，在国内时搞过法律，在这边当会计师。

许先生，原来是上海市政府宣传媒体的负责人，跟上面领导相熟，来美国创办了一个月刊杂志，专门介绍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政策。杂志每期专访一位国家领导人，政治局五个常委都先后上了他们的杂志。大使馆来人，都会拜访他或问候他一下。他支持过我的一些工作。

有一天，台湾前“监察委员”梅培德先生，约我到他家一访。梅先生是原浙江大学（当时已迁到贵州）学生，抗战后期参加国军，解放前夕去了香港，经香港去了古巴。20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梅先生又跑到了美国。经梅氏宗亲梅卓友介绍，进入安良工商会，后来跻身于美国华侨侨领行列。80年代，膺选“台湾监察院

监察委员”（海外），到台湾工作。他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美国侨界颇有名望，也做了不少工作，如创办全美华人福利总会等等。

他家住在珊瑚墙市，进门大厅里挂着台湾前“监察院长”余俊贤的大幅字墨，周围挂了不少与台湾各级政要合影的照片，有蒋经国、李登辉等等。

他知道我是从国内来，也是四邑同乡，便说了一些他的国内见闻，谈到了国共合作，说周恩来原来也是国民党，从黄埔军校出来的。令我惊讶的是，他从里屋翻出了一本《和平统一中国启动书》，是全国政协发给他的，翻开里面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签名。

他话题一转，说到了当官任职与挣钱养家的矛盾和利害关系。他热爱中国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干货公司进的货大部分是从大陆进的，单单罐头蘑菇和罐头玉米笋一年就从大陆进了十几、二十个集装箱。而从台湾，他什么都没有捞着。在他的“监察委员”任期届满的时候，他也考察了不少台湾的生意门路，可能是由于知识和工作经验不对口的问题，台湾没有适合他的生意门路。用他的话来说，就算让他任职宏基企业，他也干不了。

但是，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还不断地在迈阿密组织年轻人回国投资和做生意。

我十分佩服这些老人，心里想，不知道到我老了的时候，还有没有这样的激情。

当时，我感兴趣的是他领导的安良工商会迈阿密分会。他说，“好！春节的时候请你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24) 安良工商会

“安良除暴”乍听起来，是有“良”要安，有“暴”要除。跟水泊梁山宋江等人打出的“替天行道”旗号异曲同工，颇为近意，都是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那么在美国有何“良”要安，有何“暴”要除呢？尤其是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

春节将到的时候，我果然收到了安良工商会迈阿密分会的大红请帖。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走进位于迈阿密老城区的安良工商会的迈阿密分部。走上一条阴暗的木楼梯，进了门，是一大厅，右边有一讲坛，讲坛前放了一些木条板凳。讲坛正中的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画像的两旁挂着中华民国的国旗。还挂有一条横幅，用繁体字从右到左写着“节春庆欢”。正对着门，是一个香坛，上面供奉着关羽关云长关圣帝爷的塑像，香火挺盛。塑像下方有一个箱子，写有“香油”二字，即教会所说的“捐赠”。进门的左手边是几个书橱，最显眼处摆着曾文正公曾国藩的著作，还有一面三角小锦旗，红底中间黄绣一个“井”字，是洪门的标志。书橱里面还放着一封孙中山先生在1910年写给芝加哥安良工商会的信的复印件。整个大厅的摆设相信跟1919年安良工商会迈阿密分部成立的时候的摆设没有什么区别，一下子把我带回了从电影上看过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堂口，也使我想起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农讲所旧址是为了纪念，把20年代的东西找回来，摆设在那里，作为革命文物。安良工商会迈阿密分部是20年代到现在没有变化，而不管周围的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

穿过大厅，是一个带厨房的大饭厅，里面有人正在炒菜。那天是安良工商会迈阿密分部的春节聚会。另外的一些人正在打麻将。

1893年11月9日，广东人在美国纽约注册成立安良工商会。安良工商会的主要宗旨是为“安良除暴、亲爱团结”。“安良除暴”乍听起来，是有“良”要安，有“暴”要除。跟水泊梁山宋江等人打出的“替天行

道”旗号异曲同工，颇为近意，都是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那么在美国有何“良”要安，有何“暴”要除呢？尤其是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

之后，安良工商会在美国各地成立了分会，计有：檀香山、三藩市、洛杉矶、拉斯维加斯、休斯顿、芝加哥、华盛顿、波士顿、底特律、新奥尔良、巴尔的摩和迈阿密等31个分会。成员大多来自广东的洪门致公堂盟员。成立于清朝初年的洪门致公堂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要继承“太平天国”遗留下来的星星之火，随时准备反清起义。当时在美国的华人已经从中国国内引进了洪门帮会，把美国各唐人街的华人社团收编到洪门之下。清朝光绪29年（1903年），中国国民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夏威夷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三藩市洪门致公总堂大佬黄三德一直是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的忠实支持者，特别是在经济上，捐赠给孙中山先生不少银两。1904年，孙中山访美被美国移民局扣押，三藩市洪门致公总堂请律师解救了中山先生。袁世凯称帝以后，孙中山先生亡命日本，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号召革命党人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同时合并洪门和致公堂。1905年黄三德号召在美国的洪门致公堂和安良工商会会员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捐款支持国民革命。为了在美国对外联络的方便，二战以后，洪门致公堂对外普遍公开使用安良工商会的称号。20世纪60年代的顶盛时期全美会员大约7万人。

那天我是跟首都钢铁集团迈阿密分公司的老高经理一块去的，我们俩成了聚会里面仅有的两个说国语的人，其他人都说广东话。大家对我们俩非常客气，都主动过来打招呼。在那我见到了以前餐馆的老板，他跟我介绍了不少安良工商会的情况。

我上任当亚裔事务顾问之初，曾经问过县里亚裔顾问团的领导，他们成立亚裔顾问团最关键的考虑是什么？对亚裔社团最担心的问题又是什么？他们说，最担心的是亚裔各社团之间的内斗造成当地社会的治安问题。

中美建交以前，美国华人社团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帮会林立，各派势力常常械斗。西海岸以三藩市的协胜堂为首，东海岸以纽约的安良工商会作为盟主。1956年，在三藩市的协胜堂与当地的安良工商会分会发生冲突。冲突迅速向全美国蔓延。协胜堂在收拾了三藩市的安良工商会分会以后，派兵持枪扫荡东海岸安良工商会各据点，从缅恩州一直扫荡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据老华侨回忆，以防协胜堂，当年，美东安良工商会各分会据点，人人手拿一把枪，24小时在据点武装值班，跟“文化大革命”两派武斗差不多。

华人社团的大规模械斗，引来了三藩市警察局和移民局的注意。三藩市警察局和移民局合力围剿三藩市唐人街，以查禁非法移民为由，查封唐人餐馆和华人社团。加州检查官向法院起诉三藩市的华人社团。大陪审团发出传票，调查审问各社团负责人，并勒令交出会员名册。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三藩市华人个个心惊胆颤，深居简出；餐馆乏人问津；唐人街生意萧条。加州检查官和警方查封唐人餐馆和华人社团被各州政府和警察局竞相效尤，大有由美国西部向东扩展的趋势。

唐人街生意无非是餐馆业、唐人杂货铺，以及相应发展起来的为其服务的各行各业，如建筑装修等。检查官和警方一查禁，全都关了门。

情急之下，三藩市协胜堂偃旗息鼓，放弃对东海岸的扫荡，并向东海岸的华人社团发出了危机信号。协胜堂堂主梁锦源亲自知会本来是冤家对头的纽约中华公所主席梁声泰，发出了和解信号。梁声泰偕同芝加哥安良工商分会主席李时镜亲赴三藩市与协胜堂协商谈判，情形与电影《教父》反映的黑手党活动类似。三人敲定了应对检查官和警方查禁的方案，决定成立“全美华人福利总会”，以协调美国各地华人的利益和各地堂口的利益，派律师出面，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制止各地警察局的违反美国宪法的行为。到了1981年，“全美华人福利总会”第十届代表大会，陈香梅女士以白宫输出委员会副主席身份代表美

国政府到大会致开幕词，并调停华裔各派，才最后终结了华人华裔各帮派的纠纷。

有一点感受，不得不说：安良工商会的人都是国内改革开放时或改革开放以前从广东农村出国到美国来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都被封存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由于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有点困难，才相聚于老朽的安良工商会。大多数人在美国赖以生存的行业是中餐馆，杂货店或中国干货进出口公司。他们是被美国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的现代化社会遗忘了的一族。他们人在美国，他们的生活方式却停留在2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

我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吗？一旦出现社团之间的冲突，我能胜任县政府亚裔事务顾问的调停角色，缓和冲突，解决分歧吗？我能为他们工作吗？我能生活在他们中间吗？虽然，我也在中餐馆工作过，洗过厕所，当过服务员。

其实，我拜访安良工商会之前，中国人办的迈阿密浸信教会的人已经告诉过我这些，也问过我这些问题。他们还揭发说安良工商会里有人聚赌。

(25) 上帝与我们同在

如果你自己都不拯救自己的话，上帝也帮不了你。

迈阿密华人基督教浸信教会，以香港来的中国人为骨干，聚集了大量的华人华裔，是为迈阿密最大的华人团体。刘广华牧师不同意我这一说法。他说，教会就是教会，不能用“团体”或“社团”等名称称之。我的意思是，各个社团的人都有去教会的。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上教会。老布什总统在筹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时候，连带资助了广州7个基督教教会的重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每星期总有人过去东山教堂。我祖母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在广州培正中学入的基督教。她带我们去过东山教堂几次。

一个人在这个浩瀚的世界上孤独漂泊的时候，他无时不刻地在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就算身体不能停泊在一个安全的港湾，至少心里头能找到一个依靠。只有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上帝那无穷的力量。为什么是西方人发现、开发和统治了美洲这块新大陆？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相信是上帝的意志要他们不断地开拓，在不断开拓的过程中，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的开拓正是要向全世界传播上帝的福音，特别是向蛮荒的未开发的地方传播上帝的福音。

我去迈阿密中国人的基督教会，却没有心灵归属的感觉。总觉得用中文读《圣经》，有点读不进去，可能是因为《圣经》中英和合本20世纪初译出，充满林语堂式的不咸不淡的文言广东话的缘故，也可能是从小读《毛主席语录》那种白话文读多了的缘故。用英文读《圣经》好一点。当然，《圣经》原来是用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写的。教会里的香港文化气氛太重，教友们不是从香港直接来的，就是从香港去南美洲“砍叉烧”，再转道来迈阿密的。也有从台湾来的和像我这样从大陆来的。

教会的主要牧师刘广华是从香港来的。抗战胜利以后，他去了韩国读神学院，后来来了美国，在纽约和华盛顿都待过，20世纪70年代来了迈阿密，创办了这一个华人教会。他布道讲解《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引用一些香港30年代到60年代的掌故，什么足球明星李惠堂、影视明星谢贤，什么日本侵入香港，对香港烧杀抢掠，以及提到铜锣湾、筲箕湾、跑马地等香港地名等等。没有处过他那个时代的香港的人，以为他是像《红灯记》似的在痛说革命家史。

教会的教友都非常和蔼可亲、助人为乐，对人的关怀无微不至。一听说谁有困难，需要帮助，大家都会向他伸出友谊的手；让人觉得天塌下来，万事有教会顶着。但是，具体到个人，大多数事情是：如果你自己都不拯救自己的话，上帝也帮不了你。

凡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都有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教会也并非世外桃源，并非不吃人间烟火。在上帝无边的慈爱关怀下，各种强人、各派势力争夺教会事务管理委员会理事的斗争暗流汹涌。广东连锁餐馆的老板肥佬伍、百佳连锁超级市场的余老细等香港势力牢牢掌握着主动权；台湾国语派一直想改造教会里过于沉重的香港的殖民地文化，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台湾国语派领头的是我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会计老师张孙教授。

张孙教授姓孙，嫁了张姓丈夫，人称张孙教授。她丈夫是迈阿密大学土木工程教授，因发明混凝土添加剂而取得专利。她给我们上会计课，一下子就把我带回了中山大学。充满中国文化的填鸭式教育原来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是一个模式，不管你有没有会计天赋，把会计基本的东西填进你的脑袋，你就是会计师。因此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会计部在当地名声鹊起，让美国人体会到，填鸭式教育也有填鸭式教育的好处。美国人的教育方式是启发式的，那是明白者自明，不明白者，是怎么教都没用。张孙教授还代表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为中国国家审计署办过短期培训班。中国国家审计署经常派员来迈阿密参加“国际审计会议”。

在教会里，我也没有找到为这个社区服务的任何理由。混饭吃，有人觉得教会里有很多做中国生意的机会；对于我，迈阿密中国人的天地毕竟太小。

（26）“明星效应”与“金盘洗手”

21世纪做生意讲究明星效应，追求昙花一现的轰动效果，就像开演唱会，轰动在一夜之间，收场后，把钱赚到了，分了。天亮以后，昨天的事情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也有人跟我商量一块做生意的。

我们中山大学外语系的一位同学，好好的放着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共关系的工作不干，非要下海做生意；从纽约移居佛罗里达，做旅游纪念品生意。跟我商量，是否加盟？我给他提供过方便，在他们正在搬家的时候，用我家的地址作为他们公司的佛罗里达的法定地址；他们公司的货单、发票往我家里寄。他的生意起起伏伏，后来又做过其他生意。终于有一天，他创业成功，当了姚明他们球队的股东，美国NBA休斯顿火箭队的股东，后来又买下了克里夫兰骑士队的股份，成为这些美国专业体育俱乐部凤毛麟角的华人股东。

有一次，“南佛州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协会”在罗德代尔堡办聚会，时任总干事的我负责票务。有人打电话来订票，其中有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傅洋和北京首都钢铁集团的经理老高。到聚会上一聊，才知道他们俩原来是北京同一个中学的同学。

傅洋律师是围棋业余5段。在佛罗里达一直找不到对手。那天，在迈阿密大学上学的一位原清华的王同学，前来应战，结果两个人杀得难解难分。我突然想起什么，问傅洋：“彭真（‘文革’前北京市市长，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不是姓彭吗？”傅洋说：“老家山西，本来姓傅，参加革命后改的。”

首都钢铁集团的老高跟我说，首钢集团刚刚在迈阿密成立了一个分公司，业务主要是在美国购买矿山开采设备，运到南美秘鲁，用作开采铁矿石。首钢集团总经理周北方大手笔进行国际投资，开发国际

市场。到了2009年，我们突然发觉周北方等人当年占领全球资源和原材料来源的高瞻远瞩。他买下了秘鲁一座大的铁矿山，与秘鲁政府合资，成立了铁矿山开采公司，把铁矿石运回国炼钢。这是第一笔我国企业购买国外资源的生意。在争夺自然资源，争取国际资源价格话语权方面，作为先驱，首钢集团功不可没。

我问老高他们公司在迈阿密找了会计师没有，他说还没有，我说我是会计师。老高马上聘用了我。首钢成为了我的第一个客户。作为兼职开办会计师事务所，我是两手准备，自营会计师事务所，发展客户，收入到了足以支撑生计，便将放弃保险公司的工作，全职做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当时，重庆嘉陵摩托车公司也在迈阿密设立了分公司。

20世纪90年代，首都钢铁集团是我国第一大企业，也是北京市的第一大税户，是北京市的主要财政来源，在美国有好几个分公司。由于前北京市长陈希同和首钢集团总经理周北方相继被双规，首钢领导层换届，首钢的海外业务也正在调整。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帮他们关掉一些公司。相继被关掉的有在洛杉矶的首钢海外工程公司，在休斯敦的首钢冠美公司，在特拉华州的首钢美国公司。

不曾想，这么一做，就为首钢工作了12年，前后服务过首钢的三任驻美国分公司经理。老高后来在首钢集团内部调整中，被派去了澳大利亚的佩思作为首席代表跟力拓公司搞合资经营。2009年，力拓商业间谍案把全中国、全世界搞得满城风里雨里的，幸亏老高刚刚全身而退，没有沾边。

就这样，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慢慢就增加起来。有些客户生意做得好，有些客户生意做得不太好。当然是希望客户的生意发展起来，然后，我的业务也会跟着客户增长起来。但是商场上的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比自然界还要激烈。大多数生意都是好了几年以后，就开始苦苦挣扎了。有很多生意从一开始就没有挣过钱。

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做生意已经不可能墨守成规，已经不可能经历创业、发展、成熟到收获的一帆风顺。21世纪做生意讲究明星效应，追求昙花一现的轰动效果，就像开演唱会，轰动在一夜之间，收场后，把钱赚到了，分了。天亮以后，昨天的事情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演唱会开完以后，如果还想赖在会场不走，舞台布景也不拆，摊也不收，不可能吧？

做生意，做完，收摊，走人。做得最好的客户里面，要数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计算机系的孙博士。90年代中期，在互联网刚刚露面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网站，做电子商务，还帮人注册域名。然后，就把公司卖了。公司刚刚脱手，信息产业的泡沫就崩盘了，结果是他的钱赚到了，而买他公司接他手的那个人破产了。另外，他在炒股票方面也脱手得非常果断。现在做了海归，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去了。

另外一个就是上文提到的客户，做中国鞋生意的洪太太，把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利用完了，钱赚到了，马上把公司关了。金盘洗手，上岸了。

如果没有“金盘洗手”的思想准备，最好不要下海做生意。

(27) 飓风“安德鲁”

整个社区好像让原子弹炸过一样，一片废墟。州国民卫队进驻了我们的社区，荷枪实弹地巡逻，以防有人趁火打劫。救援物资频频运入，很多人去排队领取。保险公司的人拿着用麻布袋装的美金钞票派发，见人就发一百元，能拿出投保证据的发两百元到五百元不等。

我也该到了在迈阿密“金盘洗手”的时候了。

1992年，飓风“安德鲁”袭击了迈阿密，造成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物损失。飓风“安德鲁”的台风眼刚好在我们家房子顶上掠过。长时间在广州居住，对台风早已司空见惯。以为久经考验，小小飓风没什么大不了的；因此，当飓风袭来时，我们防备不足。结果木篱笆给吹塌了，屋顶的瓦给掀了，树都倒了；幸亏我们家的房子是平房，房子比较矮，没有被吹塌。但窗户的玻璃在飓风以每小时270公里的速度吹来时像塑料薄膜一样凹了进来。我们死活用家具顶着。

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能飞的战斗机都飞到别的州去了，不能飞的战斗机被从飞机库里吹了出来，又吹上了天，再摔了下来。海边的船被吹上了陆地，在陆地上行驶。

飓风的第二天，整个社区好像让原子弹炸过一样，一片废墟。州国民卫队进驻了我们的社区，荷枪实弹地巡逻，以防有人趁火打劫。救援物资频频运入，很多人去排队领取。保险公司的人拿着用麻布袋装的美金钞票派发，见人就发一百元，能拿出投保证据的发两百元到五百元不等。

没有电，没有水。我在后院用砖砌起了炉灶，用捡来的木头，烧水做饭。生活一下子又回到了当年民工修水库的日子。幸亏停电停水只是一个星期。

飓风“安德鲁”把迈阿密的美国生意全吹走了，以迈阿密为总部的泛美航空公司破产了，东方航空公司倒闭了，全美最老牌的储贷银行森德拉斯特银行垮了，其他美国人的大中企业总部全搬出了迈阿密，

连迈阿密最主要的报纸《迈阿密先驱报》总部也搬走了。剩下的全是中南美洲人开办的中小生意。

我在迈阿密的发展前途已经到头了。我还是坚持把注册会计师执照考了下來。这样又熬了一段时间。迈阿密的工作市场越来越差。我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找工作，准备跳槽；想找更大的公司、要更好的福利，向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工作市场却越来越西班牙语化，职场上的工作职位越来越低、越来越少。

不久我就被“承保人担保保险公司”裁员了。匆忙之间，我去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做审计和税务；兼职自己的会计客户；同时还兼职县政府亚裔事务顾问的工作。

县政府亚裔事务顾问的工作，处理过中国人开的农场在人工河里种通心菜的纠纷。县政府不让种，说是这种“草”堵塞河道。还处理过“金色冒险号”非法移民。1993年“金色冒险号”在纽约冲滩以后，二百六十多人被捕，其中有三个人给发配到了迈阿密的监狱，我们去跟他们解释一下美国的法律和监狱制度，安慰安慰他们。平常就是每个月开一次会，参加一些听证会。印象比较深的是县政府的大会议室，台上是围成一个半圆的九个县务委员的座位，每个座位有一台电视摄像机对着。台的两边是大型电视屏幕。大型电视屏幕两边是同声翻译工作室。搞得像联合国安理会那样。同声翻译主要是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我的会计客户有发展，但是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有一到两个员工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这么说吧，首钢迈阿密分公司这样规模的客户要有25家才够维持一个小型的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或是有50家中国餐馆的客户也行。

去工作的那家会计师事务所，90%是西班牙语客户，工作起来十分麻烦，还要找人帮我翻译。老板老是为安排我的工作感到头疼。我做税做得比较好，但是做得好没有用，必须要去接客，要接单子，并且能够跟客户砍价。客户不是完全听不懂英语，但是用英语根本没有

办法跟客户建立关系和讨价还价。反正是要赚钱，但是我却不赚钱。我也感到非常的郁闷，整天听不到一句英语，就更不用说听到汉语了。

其中有一个客户是政府机构——“迈阿密市中心发展署”。他们讲英语。单位坐落在迈阿密市中心最高的那栋第一联合国民银行大楼，上文也提到过。老板让我去做审计，他们安排我在他们的大型会议室工作。

那是一个有两面全是落地玻璃窗户的会议室，面向大海，看到迈阿密港口码头，看到港口码头上停泊着的豪华游轮，看到香港太古洋行买下的布里克尔小岛——迈阿密河出海口的小岛，看到无际无边的大海，烟波浩渺，看到那些出出进进的游艇，看到那些自由飞翔的海鸥。多么想像海鸥一样挣脱一切束缚，超越自己身体和心灵的极限，争取工作上的解放，我却被西班牙语死死地困在迈阿密。一个自以为被放到南极都能生存的灵魂，被困在美丽的迈阿密、纯情的迈阿密；被困死在迈阿密热带？风、热带的雨、热带的温暖和热带的风情。

“.....

春潮也会把你捉弄，
一下子将你冲得
很远很远；
或是冲到霉暗的浜汊，
使你看不到太阳
永远失去温暖；
或是冲到腐蚀的沼泽，
让水草的羁绊
困住你自由的航帆
.....”

（择自《小船》，作者：邓海桐）